

炎黄春秋

第10期

2005年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

政商勾结：韩国的毒瘤

目 录

求实篇

- 1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陈 虹
10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袁 鹰
16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金 凤

品书斋

- 22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亲历记

- 26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张培森
30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何兆武 (口述) 料峭子 (文)

- 34 一九六〇年校园伙食风波.....刘兴汉

沉思录

- 36 实事求是的几起几伏.....彭 迪
40 读巴人文章随想.....施 亮

人物志

- 44 我认识的于光远
——在于光远九十寿辰纪念会上的发言.....龚育之
49 皖东硬汉白振亚.....李 宾
51 “编外”地下工作者.....姚 强
54 黄天和他的尖兵剧社.....刘力勤 苗淑云 宫洁民

春秋笔

- 56 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王伯惠
64 日本侵华的鸦片战略.....兰殿君
66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郑连根

古今谈

- 69 秦家店的郡县制.....尹振环
73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袁伟时

海外事

- 75 政商勾结：韩国的毒瘤.....詹小洪

九州景

- 77 清代北京寺庙及其价值.....吴兆波

顾 问：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鍤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淦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4.80元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
陈虹

一 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 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



罗瑞卿

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

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 he 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

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师怎样?”

“老师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 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

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

五 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及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

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

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



杨成武

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

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

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

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

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

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

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

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了解。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 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师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

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 12 月 12 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 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 12 月 22 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 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
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

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 年 3 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 3 月 18 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



本文作者(左)与杨成武夫妇合影

填了一阕词 ,表示惋惜 :

将军一跳身名裂 ,
向河梁 ,
回首望 ,
故人长绝。

八 “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

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

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

九 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

(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

(责任编辑 吴 思)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 袁 鹰

《况钟的笔》和杂文家的笔

1956年暮春，浙江昆剧团来首都演出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华，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认为一出《十五贯》使昆剧这个濒于冷落衰颓的古老剧种看到复兴的希望。周恩来总理要求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干部都去观赏，从中得到防止官僚主义和主观武断、仓促定案的启迪。

有一天，我们《人民日报》忽然收到老作家王任叔（巴人）寄来一篇杂文，题为《况钟的笔》。

久违了，杂文！

出于鲁迅而大放光华的杂文，作为上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发挥过突出的战斗威力，锋芒所指，几乎所向披靡。鲁迅称之为匕首、投枪，瞿秋白称之为“战斗的‘阜利通’（社会论文）”，含意是相同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民残暴地肆行屠戮烧杀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们，当然未必会直接看到那些对他们进行抨击和声讨的杂文，手下那帮惯于谄媚邀宠的御用刀笔吏也未必敢如实地呈上密告信。杂文的匕首作用，更多地在于撕裂他们的画皮，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揭示他们的反动面目，帮助群众认清他们的嘴脸和本质，长人民大众的志气，灭反动统治者的威风。

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杂文和杂文家的任务起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不待言的。读者喜爱它，

仍然是由于它的战斗性、正义性和现实性。读者们期待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鲁迅和老一辈杂文作家的优秀传统，扶正祛邪，扬清除浊，发扬人间正气，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鞭挞那些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惹起群众戟指痛恨的败类。毕竟，杂文不过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不是文告，不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它能做到的，只是舆论，只是表达老百姓愿望和声音的一段舆论。然而，从50年代开始，连接不断的由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空气紧张，人们的心理也跟着紧张，报纸杂志上的杂文本来就寥若晨星，到此时更是销声敛迹，使爱好杂文的作者和读者长久地有一种寂寞之感。

因此，看到《况钟的笔》，我们副刊编辑实在有空谷足音的意外惊喜。巴人又是位老杂文家，抗战时期在上海“孤岛”，后来在南洋，曾写过大量杂文。他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公务繁重，还在撰写文艺理论文章。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再忙也要拿起笔，正是历来许多杂文家的秉性。这篇杂文很快见报，当时报纸第三版并非副刊，我们发稿时加了花边，放在显著位置，以示与同版其他稿件有别。

作者围绕况钟重新审判“十五贯冤案”时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做文章，娓娓道来，最后点明况钟当时的困境，是处于官僚主义者上司周忱和主观主义者下属过于执的两支笔锋夹击之中。“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但一个能对人民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能集中群众智慧的人，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么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作者最后殷殷期望“经常用笔而

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因为笔下有千斤,笔下更可能有冤魂。

这篇杂文,并不像作者过去写的那样有火药味,言辞也并不尖锐泼辣,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雄辩的力量。尤其是他那对人民事业负责的革命胆识和党性,更使人感佩。此文一发,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肃反”、“审干”运动之后,正处于定案落实处理之际,这出好戏对防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草率定案,具有生动而形象的教育作用。

况钟的笔触动了巴人的笔。《况钟的笔》又鼓舞了杂文家的笔。企望了很久的作者和读者,从这篇杂文的发表,似乎都得到一种信息: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仍然需要杂文,读者也仍然喜爱杂文,杂文是不会泯灭、不会消亡,也泯灭不了、消亡不了的。

这样,就促使不少杂文家又拿起冷落已久的笔。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改版,有了第八版副刊,每期副刊都发一篇杂文,加花边排在头条位置。于是,佳作纷至沓来。杂文的题材总是随处随时可得的,杂文家的责任感也是历久不衰的。一些老作家带头执笔,议论风生,他们都署了当时鲜为人知或者久已不用的假名,如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丞”,巴金署名“余一”,何其芳署名“桑珂”,林淡秋署名“丁三”,曾彦修署名“严秀”……一时间异彩纷呈,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形成了《人民日报》副刊最初一次鼎盛期。如果说由此带动了50年代第一次杂文的兴旺,似乎也不为过。

杂文进入一番新天地。然而,这个天地里既有春光,也有秋雨,更有冰雹,一言难尽。

“发现”了一位老杂文家

1957年4月初的一天,负责杂文的编辑来告诉我:“弗先又寄稿子来了,这回是杂文。”说的时候,流露了高兴的神情。我也很高兴:“是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吗?太好了!”

几个月前,曾经收到一篇从武汉寄来的稿件,题为《想到活捉》,署名“弗先”。文章谈传统地方戏《活捉》(从《水浒》宋江杀阎婆惜故事演绎的情节),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阎婆惜变鬼以后,活捉张三,并非为了索命报仇,而是思恋这个情人,死了都舍不下,要捉他一起入冥。作者说:“我们过去的被压迫人民,到死不忘活,求死为了活,并且希望死后还要活。从这里,我们从迷信中看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看到旧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残酷。”他认为对《活捉》这样的“鬼戏”,略加改革,间或演出,并附说明,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欣赏其中特有的技巧,了解旧社会人民处境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热恋,并使人们在对比中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都是有益的。作者新颖的观点和娴熟的文字功力,都使我们赞赏,“弗先”显然是笔名,不知他的真姓名,稿末只有武汉某机关宿舍的门牌。这篇文章很快便发表了,我们很希望这位“弗先”继续来稿,却如彗星一瞥,再无消息。四个多月后,又寄来这篇题为《同与异》的杂文,批评党内某些宗派主义现象,正是当时一个切中时弊的题目。更使我们欣喜的,是地址注明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宿舍,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北京。于是,编辑立刻同他联系,说报纸副刊现在亟需好杂文,请他继续撰写。几

天后,就收到回信,信未署了真名:徐懋庸。

自从鲁迅在1936年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长文后,徐懋庸的名字就带上一层似乎不光彩的颜色,在当时文化界和后世青年人心目中,至少是个反对鲁迅、攻击鲁迅的形象。其实,他从30年代起,就是一位热爱鲁迅、师承鲁迅的杂文家,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打杂集》,就是鲁迅作序并为之介绍出版的。鲁迅曾经赞许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他那封引起鲁迅不满的信,其中是非曲直,不是这篇小文能说得清,只要看鲁迅逝世时,他曾献挽联一副:“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便可窥见深沉的哀思中蕴含了万语千言。

副刊编辑“发现”了这位老杂文家,都有点喜出望外,最高兴的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他同徐懋庸既是浙东同乡,更是“左联”时代的战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懋庸远去延安,林淡秋留在“孤岛”,两人再无联系。全国解放后,徐懋庸随军南下,在武汉工作,林淡秋却由上海调到北京,也未通音讯。如今,一篇“弗先”的杂文,使两位老朋友很快重逢,住处都在东城区,相距不远,自然就时相过从了。徐懋庸建议报纸副刊开展一次关于杂文的讨论,以引起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他套用鲁迅当年用过的题目《小品文的危机》写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作为讨论的开篇。他还用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论和风细雨》、《应该让别人说完》等篇,同时期他在首都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杂文。这位在解放后只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哲学论文的老作家,此时重新拿起搁下的笔,文思泉涌,几个月内竟写了一百多篇,“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为杂文的存在和发展,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多少心血。”(任白戈《徐懋庸杂文集》序)

使人可惜和痛心的是,几个月后“他因此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泼辣的文章了”。(同上)“反右派”斗争高潮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揭发批判徐懋庸大会,林淡秋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不得不作了一个批判性发言,还要作自我批评,实在是件痛苦的事。

这位老杂文家从此沉沦,十年以后到了“文革”中,当然难逃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想振作精神,重新执笔,但是终于因为多年厄运,身心交瘁,未及看到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也未及等到自己“右派”冤案的改正,就在1977年2月7日因病溘然长逝,留下了大量未刊的回忆录和诗文遗稿。

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称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

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然而,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

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这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



吴祖光(中)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其妻新风霞随同前往

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一定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遭难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左叶事件”始末

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四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副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副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吵嚷之间，左叶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纸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副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

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于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6·8”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四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谈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十年动乱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浙江家乡参加“五四”

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30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50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50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大难临头,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

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他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的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叶 方)

书
百
年
功
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百年潮

月刊

论
人
物
风
流

《百年潮》杂志是反映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最具权威性的大型时政、文史类月刊。《百年潮》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宗旨,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亲历过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为主要作者队伍。栏目设置分为社会历史类、人物风采类、时政时事类、思想文化类、军政要谭类。

《百年潮》为月刊,定价6元,全年12期72元(免费邮寄)。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本刊发行部随时办理邮购,读者可将订阅本刊的总价款通过邮局汇给我社。

本刊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9号(中央党史研究室内)

邮 编:100080

电 话:(010)82615317

82627663

邮发代号 82—920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 金 凤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 垌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

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

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

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



商庄人民公社种的红薯计划亩产15万斤

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饭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零零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

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

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文革”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军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武斗的场面

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

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王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

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叶 方)

书屋 2005 年第 9 期目录

阡陌纵横 旧书新识	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 日本人的世俗精神 ——重读《菊与刀》 《缘缘堂随笔》在日本	蒋贤斌 贾庆军 李兆忠
尘影斑驳	1945年北大“易长风波”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	张晓唯 黄文华
湖湘人物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周扬与法捷耶夫	散 木 周景雷
名人心曲	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 废名的真 汪静之五四情诗 孙犁的“自辨” 朱东润的“蝗虫”之喻	孙宜学 陈建军 裴毅然 杨建民 王 昊
文坛景观	落叶满街无人扫 ——2000年以来的散文阅读	张宗刚
教育论坛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 近现代语文课程教育 ——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钱理群 孙绍振 胡乐乐
边走边看	俗界之欲 青楼莺声为谁啼?	伍 国 乐 云
宦海纪闻	“政由贿成” ——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官场“红楼”	李占伦 张宗子
来稿摘登	正误交织陈独秀	邓立勋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5.00 元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 话 0731-5791300 5486759 传真 0731-5790197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有不小风险,但非解决不可。陈云不反对物价改革,但因为问题复杂,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他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在过了十年以后,陈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1990年6月6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赵紫阳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

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赵紫阳又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

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既绕不过去，也不能再拖，但有风险，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在这期间，8月1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

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

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说：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据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回忆:“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开始没有作一句自我批评,李鹏、姚依林提了意见后,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严重状况,10月8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以往有时也用“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了“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的批评。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

第一,还是粮食问题。他说:

“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陈云指出目前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谈到农业,陈云认为:“种田必须养地”。但是,“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谈到工交企业,他提醒道:

“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

率。”“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陈云再次强调他历来的主张:中央必须有权威。他说:

“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说起各行其是的现象,陈云举例说:“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陈云又再次强调财政平衡,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他说: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第五,陈云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他说:

“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陈云接着说:

“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

有缺点错误。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陈云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第七,金融问题。陈云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他还提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为了准备这次谈话,他作了较长时间的考虑,并写好讲话提纲。在谈的时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讲解。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可见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焦虑和对这次谈话的极端重视。

赵紫阳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议一下。10月12日,他在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此文是《陈云传》第四十三章的部分,原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按需出版 征稿

各位作者:本广告自去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全国各地纷纷来稿要求出版。为解决出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使出版周期更短,我们做了一些小的调整,现公布如下,今后的“按需出版”照此标准实行。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单位自用、专业性强、由于量少而用传统印刷无法解决的或市场无法大量销售的图书;

●已经出版的需要少量重印的图书。

●各类论文;

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资金投入:自费。收取标准:32开内文每一面黑白页0.125元(70克胶版纸),彩色页2元(128克进口铜版纸);封面彩色每个6元(157克进口铜版纸),黑白每个1.5元。装订费:胶订一本10元,骑马订一本2.5元。版式设计及转版费2元/面(一次性),审稿费500

元(一次性)。50本以下加收20%。费用的文字基数是20万字,每增加1万字加收100元编辑费。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此类图书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也就没有定价,可以作为留世或赠送。印制质量:上乘,完全可以放心。

要求:事前签订合同。作者需提供齐、清、定的稿件和光盘或软盘一份(包括内文和封面设计,录入排版采用的软件基本没有限制,凡国内现行的均可,封面设计需有书脊和封底)。如是手写稿则另外收取录入排版费(不再收取转版费),一般每一面4元(32开),校对费每千字每校次1元(负责3个校次)。封面设计如委托我方负责,设计费为800元/个。

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按需出版主要解决印数在1000册以下的图书出版的困难,超

过1000册的还是应该按传统出版运作(我公司也可作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著述。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作者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本广告一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 张培森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 100 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 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 1980 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 2000 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 20 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情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 1980 年 5 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与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这次一起参加会的还有张闻天生前的两位老部下何方、曾彦修。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个儿不高却给人精干利索毫无老态的印象，操一口湖南乡音，谈话中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她亲口叙述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初中央的民主生活气氛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时开会都到我们的住处开，毛主席有时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娘娘”，我说“我怎么能是”，他说他只不过是帅，“我是毛大帅”。有一次开会，我在旁边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洛甫是青天，他把我们的意见都综合进去了，很好，这是青天。

这样生动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不但使我增添了对我面前这位经历不凡的老人的敬意，而且立刻在我脑海中打开了党史的一片新天地。然而回想起我同刘英同志的初期接触，走进这位坚强老人内心世界则是两个多月之后对她的一次采访。那时正是暑期，她在大连疗养，我为起草一篇纪念张闻天诞辰 80 周年的文章，专程去她那里听她诉述历史。这次采访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她对我这个后辈却是第一次作了打开心扉的谈话。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她同闻天“文革”苦

难生活时的感情流露。

她说，“文革”中有一天，外交部的造反派半夜跳墙而入，把闻天和我一起用卡车拉到外交部，先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开斗争会。第二天早晨有人端来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命令我们：“吃饭，吃完开斗争会！”当时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可这时间天很沉着，他过来摸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呵！”说到这里，刘英忍不住地流泪了。并且喃喃地说：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在困难时候想着别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坚强老人流泪。我当时就想，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多少人迫于形势背离亲人，以至离婚断绝往来，而她和张闻天却始终恩爱如初，相互扶持，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次谈话，她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罢官后，她同闻天同志俩人如何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她说庐山会议后闻天的情绪一直是很乐观的。她说她自己倒是有一段时间思想上想不大通，想不通并不是别的，而是丈夫挨批，为什么妻子也要遭受株连？她还记得一天闻天抄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一段诗给她看，并且特别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两句下面打上了横杠。刘英说，其实打从参加革命起就根本没有想到个人享受什么“荣华富贵”。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而她最敬服闻天的一点恰恰是他的坚持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俩艰难岁月始终相依的一根精神支柱。

从那次谈话以后，随着文集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到刘英家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时我住在城里，离她家很近，骑自行车 20 多分钟就到。除了办事之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都成了她家中的座上客，她谈的许多珍贵史料我都一一记在我的笔记本

上,有的一时来不及记,回家之后立即用卡片补上。她对我个人也十分关爱,那时我的住房很挤,一家四口才不到20平方米,有一天她在秘书的陪同下突然闯进我家看我的住房情况,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的突然来访,我当时真是有点手足无措,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她当时并没有插手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却从这位前辈身上切切实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传统。我那时个人生活条件尽管差些,但我工作的心情却很愉快,这里除了工作小组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之外,刘英同志的好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素,她一方面全力地支持小组的工作,然而对张闻天历史的评定却是从干预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时常提醒我们的是,对闻天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不必加以掩盖。

在上下密切配合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编辑小组经过五年的奋斗,张闻天著作的第一个选本《张闻天选集》终于在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当我来到她家翻开书中已经发表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给她看时,却又一次见到她动情地流了泪。她对我说,闻天去世前还关切他的问题什么时候组织上能有个结论,哪里会想到庐山发言今天还能公开出版。接着她就回述了庐山会议对闻天的打击。庐山下来之后闻天对她说过: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的问题,可说我是“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闻天是从不流泪的,为这件事他眼泪直往下淌。正是说到这里,我见刘英自己也都忍不住眼眶里饱满的泪水了。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流泪。

此情此景也就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为坚持真理的志士所付出的个人的牺牲和代价。如果说大多数老干部受冲击还都只是“文革”十年,而彭德怀、张闻天则是早从1959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头号的“反党集团”人物。张闻天从此冤案十七年,直至去世。十七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记得在我开始接受整理他的史料的1981年,领导上曾批准我去组织部翻阅他的专案材

料,数一数口袋就有40多包,翻一翻其中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荒唐到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初到东北时与苏联红军代表的接触,也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问题加以不断地追查。刘英告诉我,闻天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冤案的沉重打击,“文革”的残酷迫害,整个摧毁了他的健康。刘英还多次同我讲到一个问题:1974年批准恢复组织生活后,闻天一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可就是不让回京,最后才批准到无锡,无锡领导虽然对待闻天不错,然而医疗条件毕竟不如北京。他的病如若是在北京治疗,也许不至于过早去世。

冤案的折磨尽管摧垮了张闻天的健康,却没有能磨灭他的意志。实际关于庐山会议后的这段历史刘英讲得更多的是闻天同志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切。刘英不仅与闻天患难与共,而当闻天同志将这种担忧和关切化为书写笔记文稿的实际行动时,在他身边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刘英。去年我去上海见到张闻天的外甥,年已七十多岁的马文彬,他拿出舅母生前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1977年12月30日(当时张闻天还没有平反)刘英从北京寄给外甥的信中写道:“你舅舅的遗稿整理后已交给王震同志转社会科学院。”接着她说交出这些文稿“也许对党及人民有点作用,不辜负他多年带病用心血写出来的稿件”。又



张闻天和刘英

说：“我把遗稿有个地方交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2月31日她又有一封谈及选集出版和出版后工作的信。信中写道：“你们舅舅的文选出版后影响很好，只是印得少了些，供不应求。”“我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把全部稿费用于宣传他的思想。”在说到文集编辑组的以后的工作时又写道：“现在文选组又着手编年谱，随后还要写传记，工作很艰难。”最后告诉外甥说：“我今年已八十周岁了，精力日渐衰退，现在全靠我在支持与帮助。我想能趁着我还健在时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也就对得起你舅舅了。”如此饱含深情的话语表现出，她作为忠诚的妻子，是如何把出版张闻天文稿及澄清他的历史视为她晚年的一项郑重的历史使命。我作为文集组的具体负责人在同刘英的20多年接触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感受到她的这份心愿的。现在老人已经过世，我本人也已年逾古稀，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秉承她的遗愿，尽可能将张闻天书籍的再版等后续的工作做完做好。

我见到刘英同志的第三次流泪则是在2001年4月，也就是她逝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这一年春天一家杂志社邀她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员信念问题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96岁的刘老当谈到大革命失败后身边一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的时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她说这些同志是多好的同志呵！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同志在那种险恶环境下，如何将生死置之度外，不但忘我地工作，而且总是关心别人的安危，特别是对她视作比自己亲妹子还要关爱。她一面叙说，一面不停地流泪。她老人家如此动情地落泪，在我同她晚年接触的20多年过程中也是未曾见过的。对过去牺牲了的战友的如此深情怀念，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体现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一种思想境界，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庐山会议后同丈夫一起饱尝了17年磨难的一位女革命家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时，刘英已是95岁高龄。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接见刘英时曾经笑着问她的长寿之道，她的回答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想，这里所说的“过去”应该是说的个人的痛苦和个人的恩怨，而并非过去无数战友牺牲的历史。正因为始终不忘过去那些为革命、为民族而英勇牺牲的战友，才会

有她那抛开一切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为了对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教育后代”，才可以理解这样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地宣传共产党人的历史，竭尽全力地支持张闻天文集、年谱和传记的编写出版工作。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刘英晚年的这种境界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真正求实的精神。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诚如组织上在她逝世后所评价的，她一生都是“顾全党的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她自觉执行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然而她的服从并不是盲目的紧跟，尤其在事实面前想不通的就是想不通。这里不妨举出两个例子，首先一个例子，是长征中她接替邓小平工作所担负的职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她不管别人是如何的说法，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职务只是中央队的秘书长，而非中央秘书长。而且坦诚地告诉大家，她所管的范围就只是管管中央几个领导人的生活，开会做个记录。另外就是做一些中央警卫队（当时也仅仅几个人）的思想工作。谈及这些时她丝毫不夸张自己的作用，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荣耀。

再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问题。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是到了1982年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说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便要求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作重大修改，去掉“总书记”的职务。这时刘英想不通，她本人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她一直是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他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和他结婚，毛主席说我是娘娘也就是因为洛甫是总书记嘛。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负总责”哩？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

服从了，在她的文章中把张闻天这个职务改写成了“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她组织上是服从了，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到了1997年，她又带领我和程中原一起去拜访另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时，杨老向她和我们两位编辑组的同志叙述了一段有关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这个问题便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总书记这副担子。杨尚昆的这个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接受），同时这也说清楚了陈云《传达提纲》所说后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这也就证实了刘英所说的事实。

从这以后她完全支持包括文集编辑组同志在内的所有学者关于张闻天总书记职务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之前有一天（8月16日），我和何方两人到她家中陪她审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片子讲到遵义会议时也用的是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

致悼词的那句话“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样片整个放的过程刘英都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了。等到一个多小时两节片子全都放完之后，摄制组的同志征求刘老的意见时，她老人家高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连说了两句“挺好！”，最后还说了一句：“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时撰稿人李向前又向刘老反映说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审查该片时说了一个意见，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刘英立即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第二天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审查小组开会讨论时，片子得到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专门写了一篇论述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论文，刘老认真地进行审阅，完全赞成文章的观点，这篇论文隔月在无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散发后，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们的好评。

刘英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回顾过去20多年她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关怀，我们每位同志都有深切的感受。应该说张闻天文集组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都是同她这种一贯支持，特别是她的务实的榜样和教诲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闻天研究组组长）（责任编辑 萧 徐）

为本刊明年调价致读者

《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至今已度过了15个春秋。十五年来，我们在编辑工作上，团结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包括很多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和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刊物提供很多高水平的文章，使读者能开卷受益；在经济上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节俭办刊，尽力减少读者的经济负担，确定较低的定价。

近些年来随着出版成本的增加，杂志社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困难，不少熟悉本刊情况的热心读者来信，有的亲来杂志社，建议提价。他们的心和编者是相通的。社委会经多次研究，都决定通过内部节约挖潜，弥补亏损，不提价。从1998年至今已7年了，每期每册定价一直是

4.8元。

但节约的潜力是有底限的，去年以来，亏损有所增加。于是提价成了不能回避的选择，社委会经反复研究、比较，决定自2006年1月起，每期每册提价一元，这个价位仍低于相同页码、相同印制质量刊物的定价。相信这个涨幅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很多读者曾表示，他们关心的是能在刊物上读到更多的好文章，而不是每期涨了1元钱。在杂志社方面，提价增加了收入，加以进一步的节约措施，就可以维持刊物正常出版。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支持。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 何兆武 【口述】 料峭子 【文】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从1939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整整度过了七年，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

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

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年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一 “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



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反内战、争民主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打死4人，打伤20余人，造成“一二·一”惨案。图为被袭击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祥熙的夫人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积了很多。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二 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

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
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
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
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
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徵做云南警
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
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
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闹,所以紧接着就
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
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
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
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
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
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
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
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
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打得
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
“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
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
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
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
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
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
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
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
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
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
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
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
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
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
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
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
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
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
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
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
节,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

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
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
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终于
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徵。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
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
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
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朴先被
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
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
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
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
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
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
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
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
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
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凝重。云
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
“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
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
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三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
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
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
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
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
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
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
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
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
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
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13团
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
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
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二姐何兆仪读
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

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 13 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7 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 29 军抓起来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是二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



昆明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为“一二·一”死难烈士送葬,闻一多(左三穿白衫者)等教授为死难学生致哀

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柯炳生(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这在当时是普遍的)1942 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她的爱人萧前 1946 年底去了解放区,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 年毛退居二线,刘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谨,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 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 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

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去了,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问旁边的人,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开始,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帮?而有的美籍华人学者当年参加过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三青团夏令营,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当年强调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美国的科学当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论如何他们是为美帝服务的,而且入了美国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道路。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只学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也出国,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学者,也会被待如上宾,大概不致于被关进牛棚,沦为阶下囚。

(责任编辑 吴 思)

一九六〇年校园伙食风波

● 刘兴汉

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作为首都北京,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除高价糖果和糕点外,其他的东西,都要本或票。当时我在北京机械学院上学,由于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供应也减少了,致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下。妈妈经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机会,从饭馆的外边,拣些菜叶带回来做菜粥吃。那时,蔬菜也是凭副食本按人定量供应。我每个星期日都回家,经常给同学们代购一些酱油。这时学院商店里,已不卖给同学们这些东西了。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开始浮肿了,我才不给他们带了,我劝他们不要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了。

这年春天,校外针织路和大马路两侧的柳树叶,很长时间都没能长起来。因为经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撸柳树芽来充饥。学院里学生吃饭,开始使用饭卡了,在每张卡上印满小方格,每个小格表示一顿饭,按照每个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余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废了。后来发现有些人涂改饭卡“投机”。又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饭票,分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面做的食品。面值有一两、二两和四两。卖饭的人,涂了饭票之后,随时就放入水盆里进行销毁,以防出现“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现在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入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

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这么一折腾,大米哪里还像大米,精脉全没有了,一粒米发的有黄豆粒那么大,可以用手一个粒、一个粒的数着卖。同学们管这种米饭叫三熟米饭;这种窝头叫三熟窝头。吃了这样做的饭,根本不顶时候,一会儿就饿了,因为它有量无质。每天上午十点一过,下午三点一过,肚子就闹腾了,饥肠辘辘,怎么还听得了课?没办法,只有消极怠工了。有的同学请病假,回宿舍睡大觉去了;有的同学索性自己自动退席开小差了。上课尚且如此,晚自习根本没有几个人上了。同学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大家议论着,怎么办?光发牢骚没有用啊!有的同学说,干脆写大字报,让食堂负责人和院党委给同学们一个交待,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为什么这样干?

说干就干,我们班首先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大字报往大礼堂(也是食堂)的西门外墙上一贴,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因为绝大多数同学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学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礼堂的里里外外,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质问食堂负责人和院领导,为什么对这种坑害同学,欺骗同学肚子的做法不闻不问,放手不管。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骗同学、愚弄群众,请院领导和食堂负责人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解决问题。由于同学们积压了好长时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所以有的内容,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尖锐的,很有分量的。这大字报还真灵,星期二院党委就召集党、团和学生会的干

部开会,宣布有关改进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解释(据说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师,只有少数学生代表。每天卖饭时都有几个管食堂的老师参加卖饭。从这以后,三熟米饭、三熟窝头不见了,伙食的质量也略有好转。

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学院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电工实验员,跳楼自杀了。她的死,一时间传遍了学院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传到了社会上。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油黑的头发,难怪四年级工具专业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杀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饭票。事发后,保卫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谈话,让她交待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想动机?一个弱小、孤单的女子,摊上了这样的事,本来就很没面子了,现在又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后,不就是饿吗,还有什么动机?越想越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有前途了,于是就寻了短见。远在农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儿自杀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赶来北京处理丧事。学院方面给买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给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谁之过?在当时连苍天也难以回答。

这一年“五一”节之后,学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能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人挤的满满的。大会开始了,院领导宣布:现在请高教部副部长讲话。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副部长把院领导批评了一顿:“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竟然会发生了呢?一句话,思想工作做的不到家。自己私印食堂用的饭票,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要看看她为什么这样做嘛!她并没有拿去卖嘛,不就是为了填饱自

己的肚子嘛。她若不是饿急了,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事情出来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就应该适可而止。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闹出了人命?换一个位置,想一想嘛,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有些干部就是缺乏这种精神。她错了,改了就好嘛,怎么能没完没了的逼她交待这个、交待那个。还挖什么思想根源,什么动机。她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是人,是个要脸面的人呀!现在是什么时期,是非常时期。全国都在闹饥荒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的干部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学会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把人当人看,不要揪住一点小辫子,就往死里整!”

礼堂里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在沉默,在思考,好像是在向死去的姑娘默哀。副部长最后说:“我提几点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努力,抓好伙食,使同学们尽可能地吃得好一点,不要搞那些花架子,欺骗自己的肚子。有条件了可以办一些副食基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就是不能丰衣足食,起码也可以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嘛!不要忘了‘民以食为天’嘛。”

随后,领导郭良才和高锡金分别讲了话,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困难,并表示一定按上级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责任编辑 吴 思)



“大跃进”期间,北京玉渊潭人民公社社员在公共食堂聚餐

实事求是的几起几伏

● 彭 迪

抗日战争年代，我在延安看到的唯一永久性的标语是中央党校大礼堂东山墙上雕刻的毛泽东书写的大字横幅“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一直被公认为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座右铭。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经过认真的争论而肯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又赋予实事求是原则更加深远的涵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事实，通过实践，探索真理，又回到实践，检验真理的基本规律。

可是，实事求是，似乎又是老生常谈。谁都会说，但不是谁都会做，更不是谁都愿意无条件地身体力行。这当然包括本人在内。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坎坷历程，在许多关键时刻，“左”的路线主宰了我们的政治舞台，实事求是原则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贯彻实行实事求是原则主要有三难，最难是第三难。

第一难 科学方法：

它要求人们了解或处理问题首先把事实弄清。为此，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争取准确、客观和全面地掌握真实情况，并对事实进行分析，找出事物内在联系、外部关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思想概念或理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除了这是一件需要有智慧和花大力气的工作以外，并不是人人都坚信事实是第一性的，理论纲领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在很多的情况下，人们比较更相信现成的理论或传统观念，对不断变化更新的事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无意忽视，或是有意忽略。

第二难 民主精神：

它要求走群众路线，在调研和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到群众中去，把事实和政策如实告诉公众，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对有分歧的问题，更要开展

讨论，集思广益，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这好像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容易更相信自己习惯于少数人决策，不大相信群众，不承认人民有平等知情权，越是重要的，特别是可能引起不同意见的信息，越不想同群众分享探讨，无心或有意地封锁事实，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甚至不许人说话。

第三难 无私无畏品德：

它要求回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如发现过时教条或缺点错误，不管是来自哪本经典著作或哪位高级领导，要敢于修正错误，否定自己。人们一般不容易承认缺点错误，不敢修正和发展真理，甚至唯恐失去既得利益和权势地位，文过饰非、抱残守缺。要克服以上困难，不但需要聪明才智，而且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它是一个先进政党的党员，特别是领导人的试金石。

我不是理论工作者，讲了许多外行话，而且不自量力，还想展开谈谈，请读者批评指正。

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国解放前执行得比较好，我们党的领导对形势和任务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救国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符合实际，深得民心。它鼓舞了像我这代人大批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或就地从事救亡和地下工作，自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参加这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这段时期也有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一些很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但不是主流，而且事后领导还公开道歉，实事求是、承认错误。毛泽东的许多求真务实的重要著作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对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记者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反映了我们党领导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身体力行 和人民同甘共苦、平等相处、不分上下、打成一片的革命精神和气度。

建国以后,我们党掌握了政权,情况变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漠,许多重大决定事前没有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集体讨论,事后也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些错误的决策,不知道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灾害。撇开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先不说,我认为领导思想违反实事求是原则,是这一系列失误和灾难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反右派运动中,50多万无辜者被打成右派,冤案成山。多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毁于一旦,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付诸东流。但我们对不幸的受害者平反以后,没有像在延安时期那样,公开赔礼道歉,更没有表示这样的失误再不重犯。从那以后,全国民众,如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明哲保身保家、三缄其口,越是重大的国事,越不敢探讨质疑。这种沉重的政治空气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改变。时隔近半个世纪,许多人还是不敢讲真心话。

大跃进之后,由于领导错误造成人民饥饿、疾病死亡的人数不下数千万,它是无知加专制的结果。我们领导迄今从未向全国公布有关数字,也没有向受害的国人公开作过正式的深刻检讨交待,更没有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和承担应负的责任,表示改正决心。这样严重的错误不了了之,在现代国际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类大事发生之后,有的国家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弄清事实,向公众发布;有的党政成员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等等。我们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还没有深刻的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人民有正式交待。难怪这类错误会继续发生。人们很难忘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三军元帅彭德怀等由于实事求是,对缺点错误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后的悲惨遭遇。

文革的错误,性质远比反右斗争或大跃进更严重,存心有意伤害好人之事不胜枚举,斗人为乐、见死不救成风,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传统美德一扫而空,受害人民何止万千,教训之深无与伦比。实事求是原则受到彻底摧残。这场史无前例的人为浩劫以后,人们痛定思痛,举国上下要求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认真全面深刻反思,检查错误根源,杜绝悲剧重演。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跳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见天日,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虽然在当时“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下,决议没有触及问题更深层的根源,也没有更广泛地听取广大受害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可是,大家相信这个决议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新启蒙的开始,而不是结尾。人变得更加勇敢明智,看问题、做事情更加实事求是,个人崇拜之风大有减弱,书本教条束缚也有松动。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大胆地突破思想牢笼,走向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遵从了某种现成而又说不清的什么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实践革新。例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包括个体经营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和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权益和自由,而不是拘泥于过时的教条,对外国的成功经验也不是一概排斥。

但我们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起步不久,经验不足,步履艰难,经济发展过热失衡,贪污腐化泛滥,贫富悬殊扩大,失业、失学交织,世风江河日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全局性的原因是政治改革裹足不前。我国的政治领导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中央到乡镇,权力过分集中,缺乏自身或人民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难怪官僚主义掩护支持的贪污腐化恶性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畸形发展原因很复杂。它多少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矛盾,理论上虽然肯定政治改革之必要,但真做起来又顾虑重重,怕担风险,尤其是要同上千年的封建政治决裂,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再加上自满心理和权势得失考虑就可能对政治改革望而生畏,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归根到底,问题在我们对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是无私无畏、坚定不移。

中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源远流长,中国的古老文明使我们感到自豪,但它的负面影响又使我们背上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1981年党中央通过的第二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并没有肃清。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国土臣民概属皇帝私有。好皇帝可能为人民做点好事,但

老百姓绝无权议政、参政,更谈不到起什么监督作用。帝制推倒以后,这种大权独揽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毛泽东赞同秦皇专制,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现行的拥有绝对权力而实际上无多少监督、无多少制约的政治领导体制仍然保留了这种皇权色彩,给贪赃枉法的各级官员以极大的活动空间,而给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权力适当制约分散的建议没有留下多少余地。

我国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涵义应该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对敌人实行专政。但如果理解或执行得不正确,就可能走偏方向,对付敌人的专政被用来对付人民。顺便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中“专政”这个词来自西方,直译是“独裁”(dictatorship),译成“专政”好听一点,其实就是专制独裁的意思。专政也好,独裁也好,同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捏在一起运用,必须高度慎重和警惕,稍有粗心大意,就可能铸成大错。回顾一部新中国的历史,由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知道有多少对党、对国忠贞不渝的好人、能人被错当敌人而受到专政之苦,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中,往往凭一件事,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给人定罪,而且对这一句话还可断章取义,以达到定罪的目的。

毛泽东在他早年的名著中指出,区分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处理好这件事,关键所在是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才能得出公正判定。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为了保证调查研究准确无误,还需经过独立的,和有监督的司法程序,而不是由某部、某人一言判定,不由分说和不加核实。这类涉及人民身家利害和政治权利的问题,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虽有很大改进,但不能说过去那种不正常、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完全停止。

如果说我们领导对“专政”一面十分重视,甚至可以说过分敏感而常常在处理中造成失误的话,对“民主”、“自由”一面可以说不够重视,甚至有几分疑惧。解放前,我们的纲领、政策、声明、文告十分强调民主。建国后,我们很少系统地组织关于民主理论和实践情况的研讨。有时提到民主,

也不超过三言两语。对自由问题几乎绝口不谈。过去几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只提爱国主义,不提民主与科学。这当然不是偶然忘却。其实,爱国主义所有国家都提倡,不是中国五四运动唯一和主要的标志。没有科学和民主自由,爱国主义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和深远的涵义。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至理名言在中国写文章时可以偶尔说说,但不是人人都很信服,似乎天下没有自由的民主,也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也不奇怪,因为专政是对付敌人,我们经验很多,做得比较得心应手,而民主自由对中国来说是新生事物,涉及人民权利、领导权限、选举制度、民意机构和议事程序等等的规范,相当复杂,需要根据中国国情,逐步推行。人们都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要求一蹴而就,也不主张全盘照搬外国做法。但许多人盼望对这个大家关心的政治改革问题采取更加积极态度,不要消极等待或闭门造车,至少可以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开展准备工作,通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展开自由讨论,发扬民主,互相启发,集思广益,共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革的道路。也许因为中国太缺乏民主传统,而政治改革又最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这种起码的要求似乎也难以实现。

除了处理当前的问题外,我们在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违反或回避实事求是原则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现象。有人相信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的必要措施,尽管这是明显的违反事实。我国官方垄断了许多历史档案,往往根据政治需要,或夸张或掩盖,或篡改事实,达到美化某些人或丑化某些人的目的。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从历史中抹杀其人其事。在电视人物传记节目中,这种虚构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这些不真实的宣传一时可以在媒体中占压倒优势,但严峻的事实是,许多知情者的见证和大量民间和境外出版的读物的真实性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官样文章和“正史”。怪不得人们千方百计想从“野史”中了解更多、更全、更真实的情况,而有关当局则竭力想堵死这种“漏洞”。这种世界少见的信用危机咄咄逼人,丧失了信誉恐怕不能靠更多铺天盖地而不真实的宣传或靠封杀反映真实情况的作品而挽回。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曾尖锐地指出:“历史

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毛泽东早期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立场,他后期的严重失误也正是因为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创业中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也应该归功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破旧创新的毅力和勇气。邓小平是从不公平地和不实事求是地被罢免压抑后由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拥戴重新上台的领袖。我亲自在场目睹耳聆群众发自内心欢呼“小平你好”的动人场面。我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人民拥护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否定过时和错误的教条,摆脱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思想的枷锁,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拨乱反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据我了解,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衡量自己也是实事求是,并不提倡对他搞个人崇拜。他甚至说自己一生的功过是对半分,虽然这是他过分谦虚的表态,难能可贵。但也反映出力求实事求是是他的一贯立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他对外开放的视野十分宽广,1979年我作为新闻助理随他访问美国时,亲自在场听到他对美国总统卡特说:“我们不怕你们(美国)的思想影响,我想你们也不会怕我们的思想影响。”这种面向世界高屋建瓴的气概体现了我们这个大国面对时代的挑战的度量和勇气。

历史的前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思想解放势不可挡。形势发展、多元多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流通无孔不入,它以空前的规模、速度与深度,突破人为的疆界和禁区。在当今世界,关门闭户的政治是行不通的。这个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分胜负的时代,严峻地考验我们的国家和个人。如果我们真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们就不会以自己认定的相对真理当作不能与时俱进的绝对真理,而会虚怀若谷,兼容并包,同人民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共同追求真理,鼓励欢迎各种建议,特别重视不同的意见,保护和尊重少数。对一些爱党爱国、忧国忧民、有独到见解、对权势名利、金钱诱惑不屑一顾、敢于直言不讳、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团结爱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对待可能是错误意见也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轻易冠以“自

由化”之罪名,歧视压制,重犯过去的历史错误,何况说不定真理在少数方面。我们的领导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苦拼几十年的政敌都能团结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什么对在同一战壕中同生共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战友反而相煎何太急,不能和解宽容?

回到我的主题,实事求是原则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必经之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人都应该有权运用这条原则来谋生计求发展,为国家作出贡献。在涉及国家或个人命运的问题上,领导有责任为人民创造运用实事求是原则的条件,帮助他们分享信息,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对重大问题共同做出决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只有启发人民共同参与国事、交流意见,在实践中达成共识,才能建立真诚的同志关系,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上下一心、生死与共。也只有这种真诚的团结互信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稳定和谐,避免风险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人的伤害或损失。

当前,我国面临艰巨而复杂的改革任务,我国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长足进展,新观点、新作风令人鼓舞。如果全国人民,包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公民,能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坦诚相待、团结一心,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中,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创新,我党的领导地位将能长期巩固,执政水平将更加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健康,我们的事业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实事求是”是真正的铁的规律,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反其道而行之,迟早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思想解放再解放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动力,深信有智慧、有胆略的中国人民通过实践、再实践,讨论、再讨论,总会找回失落的实事求是原则来弄清什么是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什么是中国特色,找到二者结合,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虽然我自己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我并不悲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坛常常销声匿迹,但实事求是的思想,家喻户晓,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历史的发展将决定于人心的向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叶 方)

读巴人文章随想

● 施 亮

前些日子,我从书架找到一本小册子。这本薄薄小册子纸已发黄,没有出版社,没有装裱,甚至没有书皮,总而言之不是出版物,只是内部传阅的“材料”。这样的材料曾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流布,尤其文化大革命里更数不胜数,大概50岁以上的人们才能对此有所记忆。小册子封面印着黑体字“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选辑”,下面一行小5号的铅字:“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最下方则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反右倾学习办公室编印”,还有日期:“1959年12月”。这本“选辑”共收有王任叔先生的16篇文章,大都是他在《人民日报》、《新观察》、《北京文艺》各大刊物发表的杂文,也有从他的著作《遵命集》中选录的文章。

唯有一文最有意思,标题是《说“劲”一文摘要》,附有一段编者按:“这是王任叔为《新观察》写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谈到‘熬劲’的问题,在发表时由编辑部删掉,现在我们根据原稿把它打印出来。”一段被编辑部删掉的文字,居然在反右倾运动中又查找出来,作为他反党证据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文网之密,罗织罪名而无所不至。这段文字大意是说,有人提出疑问,为何大跃进了,又引起了副食品的困难呢?他解释道,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克服一穷二白,所以大家要有一股“熬劲”。这段话如今看起来挺平常,又有什么错呢?我想,是提到“副食品困难”几个字眼了,这就是在秃子面前说“光”,说“亮”了。虽然作者主题是鼓劲,却也有曲笔之嫌,编辑部只好删去这段文字,而以后竟又成了作者“右倾”的铁证之一。

“选辑”中,王任叔先生的大多数文章是写

于1956年底或1957年上半年,正是大鸣大放时期。这些文章中,有一大类提出要讲人情,要爱人,要尊重人的观点,反映此观点的文章有《论人情》、《真的人的世界》、《略论要爱人》等。而《论人情》一文在读者中反响最大。后来,王任叔先生连续在《给新港编辑部的信》与《以简代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能‘通情’,才能‘达理’”的思想,而且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此类文章最为深刻透辟和挚情感人,可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媲美。另一类文章是批判官僚主义作风的,如《“上得下不得”》、《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等文,不仅针砭了摆官派、讲排场、不办实事的官僚恶习,还发掘出此种恶习的封建主义历史根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再有一些文章则是反对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风气,主张“对文艺上,采取宽容的方针,就是为的要从无到有,从有到繁荣。”这些文章都是思想很深刻又具有精粹艺术性的小品文或随笔,题材新颖,切中时弊,文采斐然,可见一位老作家独特有个性的精彩文笔。

王任叔先生,笔名巴人,是30年代参加左联的老作家,那时已有名气,出版过长篇小说《死亡线上》和几本短篇小说集,还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及杂感。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入党了,曾任广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日战争中在南洋群岛开展华侨文化活动与统战工作,参加过印尼人民的武装斗争。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国驻印

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艺报》编委等职务。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降职，又被遣送回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残酷迫害，1972年病死在老家浙江奉化。传说是倒在打谷场上死去的。他50年代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主持工作，是执掌实权的领导人。总的说来，他很干练，有魄力，工作雷厉风行，而且局面开阔，确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社里的许多老人常把他的名字念叨在嘴边。

不过，社里的一些老编辑们也对他颇有微词。我读过《舒芜口述自传》，书中用较长篇幅批评王任叔在单位中一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使人们感觉到其日常生活所行与其文章所言完全不一样。比如，他在文章中反对官僚主义，但在单位里，他的官架子却很大，平时正社长冯雪峰上班自己雇一辆三轮车就来了，而“王任叔来来去去可像回事，从来都是坐在小车里，一副领导派头。”（《舒芜口述自传》259页）其实，他坐的车是上级配给冯雪峰的，因为冯雪峰是副部级高干才享有此待遇。他在很多文章里主张要通情达理，要爱人；但在单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善于整人，翻脸无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搞私人报复，将给他个人提意见的编辑扣上反党帽子。尤其在反右运动中特别过分，竟然把古典文学室的多数编辑们“一网打尽”，搞成“右派小集团”。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顾学颉先生在《杂谈聂绀弩诗》一文中披露，聂绀弩老人的诗集《三草》里有一首诗《题林冲题壁》，原来的题目是《题林冲题壁寄巴人》，在诗中很忿怒地将王任叔比做了陷害林冲的高太尉。顾老写道：“这首诗未必真的寄给了巴人，不过在纸上发发怒气而已。”可顾老以为，这样比拟“也不算过分”。这也是因为，给聂绀弩老人构罪时，王任叔先生确实起到关键性作用。还记得，1975年我向顾老请教古文，他与我闲谈时说，一些老同事跟他回忆往事，都慨叹当年王任叔整人的手段太厉害，简直是穷追猛打，不留余地。可整来整去，却整到自己头上。顾老就是在鸣放中只给王任叔个人提了意见，便被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的。顾老是一位颇具儒者风范的老夫子，极少



巴 人

论人短长。此话由他而言，可见王任叔先生的某些作为实在伤人至深，很不讲“人情”，闹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们怨声载道。

小时候，我也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王任叔的名字。父亲对他很有意见。1955年底，一封匿名信诬告先父施咸荣是潜伏特务组长，解放前害了7条人命，于是单位立即将父亲拘押起来，关了将近半年。期间，母亲正怀着我，曾请求去探视父亲，也被单位拒绝。父亲冤案平反后，又值大鸣大放，单位领导多次叫父亲提意见，甚至带点儿胁迫地说，你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整，真的就没有看法？你闷着不说，是对党不交心了。父亲不为所动，依旧谨言慎行，只说：“有人写信告我，组织上审查我是应该的。”倒是他的同事、团支部书记周纯先生（曾是其专案组成员）替他鸣不平，认为拘押父亲时不让母亲探视，太不人道。犯人服刑都有被探视待遇，为何被审查之人却不能享有此待遇？反右运动来临，周纯先生随即因这些言论被打成右派。领导又命令父亲揭

发批判周纯先生,父亲拒绝了。他说,过去我受人诬陷而遭伤害,如今我岂可再去陷害别人?没有的事情我绝不能编造。这种态度惹恼了单位领导,只是父亲在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无法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便将他划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处理,行政予以降一级处分。而父亲的同事周纯先生则遭受更严重迫害,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劳动教养。父亲对此事长期念念在心,病逝前还用颤抖的手写下周纯先生名字,希望以后能找到他。直至去年底在京召开“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周纯先生在上海看到报纸的报道,委托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与我取得联系,并写来一封信道,“施亮:看到过你两次。第一次其实是‘知道’你。专案组长派我到门口去告诉你母亲,现在见面对你父亲不利。我目送你母亲离去,那时她已临产。我想到了人道主义。尤其是后来听说,那时专案组长自己也正怀孕。第二次是你父亲‘解放’后第二天回编辑部。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了一套新制服,满脸喜悦。大家拥上前去争着看他怀里白白胖胖的婴儿——那就是你。你父亲是一个宽容的人,没有因为这些人前些日子还斗过他而耿耿于怀,允许他们和他同享‘双喜临门’。我站在一旁,心酸得说不出一句像样的道喜的话,只感觉一丝凄凉的安慰……”这是前面的一段。他的信真是字字辛酸,行行血泪。周纯先生被遣送至右派劳改队后历经重重磨难,一直未婚。错案改正后,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1988年赴德国定居,并在那里找到一位德国妻子。在德国,他以自己坎坷人生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德文版的一部回忆录和一本长篇小说。近年,由于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他又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当然,王任叔先生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对聂绀弩、顾学颉、舒芜、周纯及先父等许多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他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他做的有些事情也比较过分,单位里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因此,王任叔先生的重要错误应当是极左,恰恰不是右倾。他以后也被归于极右分子,实在是历史的一幕荒诞剧。此时,再重读他的“选辑”中那些文章,心中却有另一番滋味。其中有《略谈要爱人》,他摘引了1956年9月8

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通讯《是畏罪自杀,还是含怨而死》,对于刘众农业社干部诬保管员刘三奴偷盗,将其逼迫自杀事件,义正词严地进行一番评论,以为“这是我们新生活中的‘新十五贯’。感慨之余,自然要发些议论了。”他坚决反对动不动就用“公审”和“开群众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那些“新过于执”们表示了激愤,呼吁要杜绝主观、武断和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官僚作风。这是一篇掷地有声、情真意切的好文章。不过,我读完此文,却也要发一些感慨了。他在文章中体现出的高尚人道主义情怀,与他在现实中的过分行为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他在政治运动中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肆虐整人,挟嫌报复等等,倘若只是思想僵化,一脑门子阶级斗争,倒也可以理解,而偏偏他却在文章里讲人情、讲人性,自己的具体行为则另行一套,言行相悖,相去又何其远矣!难道真的就是文未必如其人吗?

我想起了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论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此诗的典故是讲晋代文人潘岳(字安仁),他一方面在去官闲居时可写出情韵高雅的《闲居赋》,远绝尘嚣,栖身林泉,似乎绝意于宠辱之事;另一方面,他又依附豪门,谄事权倾一时的后戚奸臣贾谧,甚至守候在路旁,远远见贾谧的车驾过来,便恭恭敬敬望尘而拜!舒芜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这个主题,究竟是文如其人呢,还是文未必如其人?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常常使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家困惑。自然,文如其人,是较为常见的文艺现象,也就是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可是,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总喜欢将善与恶绝对地相对立,孰不知善有时会转化为恶,而恶行又出乎意料会得出好结果。茫茫大千世界,心灵世界与外物世界的交流也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感情的生发更没有规律可循。生活中哪里能找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呢?如今许多电视剧最喜欢将人物性格做简单化描写,使得人物的善恶分明化,这是违背生活本身特点的。它忽略了人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铁则。所以实际上,在中外文学史里“文未必如其人”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虽然,元好问得出“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结论失之于武断与绝对,可“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状况确实并不罕见,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就是一例。也可能,这是他漫长生涯的特殊时期,他的内心那时也充满了微妙复杂的矛盾。我对王任叔先生的一生并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也只能就事论事而言。

一位朋友对我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有一弊病,就是坐谈义理太多,真正动手做实事很少。”我颇有同感。这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痼疾。自从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以后,士大夫们自称奉行朱熹“知先行后”的理论,其实只在那里坐而论道,知而不行。宋儒理学成为显赫的官学,科场的规范教本,专制主义的道德伦理幌子,所谓性理之学完全成为口头空话。王阳明的心学以后企图纠正此弊病,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其所说的“知”,并不仅仅是感知,可以说是一股引导行动的精神。但王阳明的心学却并不为士人们所重,历史上统治者也多次刮起禁绝心学之风,更使得陆王心学不可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思潮。中国古代士人们宁可将儒学作为一种“话语游戏”来玩耍,又有多少人愿意力行实践呢?我在《寻根》杂志发表过一篇论述王阳明思想的文章,曾经探索过此问题。再论及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相悖的现象,实质上亦是一个“知”与“行”的老问题。我丝毫不怀疑王任叔先生在文章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也是他内心深处所信奉的理想,可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人因事因境而异了,也仅仅只变成“话语游戏”了,甚至言与行完全相悖!这样的现象,应该给当今知识分子们以怎样的警戒作用呢?这是我们应当深思的。

或许,对已经逝世的一位老作家如此批评,有些不太厚道。我又是后学之辈,哪里能真正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写此文时,我曾经颇感踌躇。记得先父晚年与我论及王任叔先生时再三地说,这不只是个人品行问题,而要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来看此事,由于王任叔先生在鸣放中写了不少文章,他可能怀有一种恐惧感,大概正是这样的恐惧感迫使他做出那些过分的事情。他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而且受害程度比他人也更惨。在文革动乱中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母亲问他为何事郁闷?他叹一口气说,上午造反派组织把王任叔从老家揪来批斗,斗一场下来,王任叔身体虚弱不堪,已走不动路,只好坐在台阶上,他看到此情景心里是极难受的。此后,父亲对他更加抱有宽容态度了。大约是1992年,宁波大学拟召开纪念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请父亲去参加,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诧异地问,您对王任叔原来很有看法的,怎么同意去参加他的纪念会呢?父亲笑一笑说,他毕竟是我的老领导嘛,人还是要大度。可惜,父亲未及参加此会,不久就查出患有癌症,住进医院了。

(责任编辑 吴思)

首都的文学

高阅读率
高获奖率
清新独特

文学的首都

高转载率
高关注度
活泼厚重

原创文学的精品阵地 社会焦点的文学视窗——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

发行量连年攀升 教育问题报告文学佳作迭出常被争相传阅

【品牌栏目】

“现实中国” “好看小说”
“新人自荐” “文化观察”
“天下中文” “作家热线”
“作家人气榜”
“真情写作”
“纸上交流”



装帧精美 每期152页 定价7元 全年定价84元

国内邮发代号: 2-85 国外邮发代号: M428

通讯地址: 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 北京文学杂志社 邮政编码: 100031

订阅电话: 010-66076061 66031108

我认识的于光远

——在于光远九十寿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 龚育之

今年于光远同志九十大寿，明年于光远同志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我们大家聚集一堂，把这两个日子合并到一起来祝贺，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合到一起祝贺，那就是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五十周年。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建立于1955年。这个制度，是在学习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情况变化和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许多的创造，这中间的继承性，当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一大批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院士基本上都被学术界推举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请为学部委员。这就看出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在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会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中就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人。这五位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因为他们官大，要管科学工作，就让他们当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呢？当时中共中央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是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却并没有当学部委员。可见，这五位不仅因为他们是管科学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也有较大的共识。所以，应该认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总的说来，如同院士一样，是学术界对一位学者的学术造诣的承认和肯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一律改称院士，并且多次进行增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没有改称，也没有增选，大概是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还没有拿定主意吧，但也没有人否认曾经有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这一相当于院士的学术称号。说相当于院士，不是今天的推论。60年代印尼共的总书记艾地，要求中国赠予他院士称号，当时中国没有院士称号，只有学部委员称号，赠予艾地学部委员称号时，正式规定：外文即译成院士。

前些日子庆祝学部五十年，《科学时报》发了几大版特刊，其中一版照片，大字标题为《一

同走过 50 年》。共登了 1955 年成立学部的時候，担任学部委员而至今在世的自然科学家十六人，最年长的贝时璋，一百零二岁，最年轻的黄昆，八十六岁。社会科学方面，至今在世的四人，最年长的薛暮桥，一百零一岁，最年轻的于光远，九十岁。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老话，现在已经过时。现在人们高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七十。据最近来北京演说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预测，一百年后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一百二十岁。这个推测靠不靠得住，反正是将来的事，不去管它。“人生九十”，则至今仍然是稀有的事情。再加上担任学部委员（院士）五十年，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年，所以值得祝贺。

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师从周培源，做过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毕业论文。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样，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又成为他的专业。在延安，他是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是他，同屈伯川一起，去邀请毛泽东到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是他，在新哲学研究会上参加讨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是否已经到来，依据自然科学上水从液态转化为固态（冰）有一个过渡状态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进餐时把他拉到身边，说：他的发言有见解，学哲学还是要懂一点自然科学为好。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在延安大学开设了自然发展史这样一门大课。是他，在延安重新翻译和发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名文，为他那个在建国后出版和广泛发行的

《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开了个头。所以，他在学术上渐露头角，首先还是在自然辩证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这个方面。

我和于光远同志认识，是在 1950 年，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来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那时他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热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中宣部由于光远主编的《学习》和《学习（初级版）》，他所写或与人合写的《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是那时真正畅销的刊物和书籍。他还与王惠德一起在中央广播电台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那时还没有电视，广播是很有力的传播工具。由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广泛影响，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学者。

50 年代初期中宣部新设立了科学卫生处分



于光远

工联系自然科学和医药卫生工作。第一任处长是音乐家赵 沅,后来到文化部当艺术局长,最后到中央音乐学院当院长去了。第二任处长是秦川,后来调任宣传处长,最后当《人民日报》社长去了。他们是我的第一和第二个上级,我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各自在合适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专业方面说,他们都不能说是领导科学工作的最合适人选。按理说,于光远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老干部,应该是最合适人选。但是,于光远说,他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已经这么多年,再回去专管自然科学,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那时他大概正在参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类很重要的理论文件的编写工作,不可能转到专管自然科学的岗位上来。1954年中宣部机构调整,医药卫生工作分了出去,科学处明确既管自然科学,也管社会科学,胡绳来兼处长,于光远为副处长,不久于光远任处长。所以,他们是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上级。

国家科委和中央科学小组成立后,中央联系自然科学工作主要通过科委党组和中央科学小组,不再是主要通过中宣部。但中宣部的科学处仍然保留,处长于光远也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并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从领导职责来说,他仍然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科学。

于光远在科学处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的“文化大革命”为止。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参与和指导了1956年《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和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根据后面这个规划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专门杂志),并且兼任研究组长和杂志主编。他参与和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上做两次发言,从阐明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而言,他的发言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他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作了大会发言。1958年,他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应该说,这是“科学学”这门

新科学在中国的发端。他和陆平建议杨献珍、艾思奇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三年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后来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为这个学科领域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在60年代初,他参与了调整科学政策的《科学十四条》的制定,又随聂荣臻同志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新的十年科学规划,听到了毛泽东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坂田昌一论基本粒子的文章的称赞,并同周培源一起被毛泽东请去讨论坂田文章。1965年他提议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坂田文章,按毛泽东谈话精神撰写了编者按语,在全国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里提到的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科学政策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的大事。于光远的精力,更多地还是关注在社会科学方面,这方面我就没有资格多说了。只是记得,他参加毛泽东组织的调查组,到湖南做农村调查,为《农业六十条》作了准备;他作为主持人之一,在中宣部教育楼每两周召开一次经济座谈会,讨论当前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他还调来一些人在他身边帮他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通用教科书,这显然是一项中央交办的任务,已经出版了上册,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而其下册,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却变成了一项长期的研究任务,这原因,我们今天都能理解。已经出版的上册,因为是通用教科书,读者是很多的,我想,这是他在《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之后销量最大的著作吧。

“文化大革命”中于光远关“牛棚”,挨批斗,到宁夏干校劳动改造,过的是周遭把他当贱民的日子,然而一次到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大为惊讶,疑惑地问:“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医生对这位落难的学者充满了敬意,给予了细心的治疗。

“文革”后期,于光远回到北京,没有分配工作,在家里约集一些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资料书。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聚集一批复出的“大秀才”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为政

研室负责人之一，积极投身到按邓小平的指示推行全面整顿的紧张斗争中去。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和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政研室协助国家计委修改《工业二十条》，于光远都是参与其事者，这两个文件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列入三株大毒草之内。最近，于光远出版了



本文作者(右)和于光远合影

一本《我忆邓小平》，详细地回忆了在政研室那一段的事情和后来邓小平再一次复出后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他受邓小平委托帮助邓小平起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情况。邓小平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被称为“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文选题注），“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十五大报告）。邓小平为准备这篇讲话亲笔起草的一份长达三页的详细提纲，一直保存在于光远手中，这件事《百年潮》杂志披露后，引起党史界很大的兴趣。

如果把于光远在建国以后的经历做一个粗略的分期，我想，在中宣部的那段时期，算是一个时期；到国务院政研室以后，算是又一个时期；退出第一线以后，直到现在，算是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他领导下的一名干事，作了以上的简单叙述。在第二个时期，他参与的工作，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显然比第一个时期更加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同时任职于国务院研究室（这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后身）、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还是学跨两科。这个时期，从工作岗位来说我已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别的同志对他的学术活动会比我了解得更多更具体。我只说说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事。

一件事是他给方毅和邓小平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得到邓小平批准。原来邓小平同方毅、李昌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时就说过：要注意吸收于光远，他搞理论有专长。自然辩证法他比较突出。制定科学规划请他参加，当你们的顾问。邓小平批准于光远这个建议，自然属于顺理成章。于光远被选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第一、二两届理事长以及以后各届的名誉理事长，并任《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名誉主编。他倡议编写《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亲自写了几个关键性的条目。他提倡自然辩证法不但要研究天然的自然，还要研究人工的即社会的自然，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密切联系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打开了广阔的道路。他按照这个思路，汇集和重编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著作，出版了一部书，题为《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还有一件事是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的联盟。在他的建议下，中国科协成立了“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第

一届主任是钱三强,副主任是于光远,第二届主任是于光远。这个委员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把举办“捍卫科学尊严、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连续论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也是于光远在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任上已经开始的工作的继续。他为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专门写了学术著作。反对伪科学,发言和著文的人不算很多也不能说很少,但写出专门的学术著作的,我只知道他一位,我想,这本著作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应该占有它自己的地位。

退下来以后的第三个时期,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一生经历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时期。无官一身轻,他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有了更广阔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空间,思想境界上也更加挥洒自如,独立思考了。他这个时期的著作比以前更加丰富,几乎每年都有几部著作出版。每年都要游历许多地方,近年来虽然行走不便,仍然以“坐轮椅,走天下”为乐。又学会了电脑,一个指头敲键,自称“一指禅”,还开通了自己的网站。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些年他又涉足一个对他来说是新的研究领域——党史研究。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听说,有的经济学家劝他多写这方面的著作,因为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别人还可以写,党史方面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只有有他那样的经历的人才能写。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

记得五年前,为于光远祝寿,我献上八个字:“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初衷”就是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不管后来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最初追求的革命理想和确立的科学信念,决不背离。于光远刻了一方印章,曰:“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历史

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那时还没有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我拾来这个词汇,完全是在无意之中,献给于光远,我认为很合适。

现在,我把这篇致词,缩成四句话,整齐压韵,但算不上诗:

人生九十古今稀,
学贯两科今更奇。
不背初衷坚信念,
与时俱进奔期颐。

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作者注:此文写成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又有两人逝世,即自然科学方面的黄昆,社会科学方面的薛暮桥)


(责任编辑 萧 徐)

博览群书

邮发代号: 2-868

欢迎订阅 2006 年《博览群书》

评论推介 书海导航 兼容并包 促进沟通



《博览群书》由胡耀邦同志题写刊名,1985年创刊,是光明日报主管主办、受读者欢迎的有影响力的书评月刊。

《博览群书》注重独立评论,以思考的深刻和评论的深度见长,既具学术性,又较耐读。透过杂志,读者能选读对社会文化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好书,把握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的精神脉动。《博览群书》是了解中国文化、出版动态的便捷渠道;是评论者、出版者、写作者沟通、交流的平台,是增进学识、陶冶性情、提高个人修养的园地。

主要栏目有本刊特稿,选择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及社会和文化热点,约请知名学者予以评介;文化思考和学术评论,大多是围绕书讨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读书时空,评介国内外新书及经典名作;书人书事,荟萃名人名著、讲述书与人的故事。

刊号: ISSN1000-4173 / CN11-1091/G2

定价: 7.5元/册

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010) 67078104-07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编辑部办理邮购

皖东硬汉白振亚

● 李 宾

白振亚，安徽省滁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人称皖东才子，写有中篇小说三部，还有通讯、报告文学、论文等多种作品问世，最近他的文选即将出版，他约我写点读后杂感，评文评人皆可。我与他交友三十余年，自然乐于从命。

在青山叠翠、万壑飘香的红琊山林场，我们坐在招待所两张木板床上面对面，促膝而谈。对于他“反对中央决定”，18年前我就有耳闻。这次我点出话题，没想到他把两次所谓的“反对中央决定”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

1987年，白振亚在天长汉涧搞金融改革试点时，突然听到胡耀邦总书记下台的消息。他在听了传达后，说了自己的一点个人意见：17个老同志开了个民主生活会，就把党中央总书记免掉了，我认为这是违背党章的组织原则的。

此事被人举报，说是白某人“公然反对党中央决定”，甚至还加“英明”两个字。省地有关部门视为大要案，要兴师问罪。滁州地委也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请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到会。未等班长点名，白振亚便主动发言，阐明了上述观点，并郑重宣布：假如因为我维护党章，捍卫党的组织原则而被开除党籍，无上光荣！

老白说，胡耀邦同志犯了什么错误？照冯文彬同志说明的是“六条”，其中一条说他提倡高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至于说高消费、中消费、低消费，不是谁提倡的，而是由生产的水平决定的。消费的档次同产出的水平是成正比的。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用促销手段，拉动城乡市场发展经济的。耀邦同志的这些消费观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远见卓识，是经得起实践检

验的真理，有功而无过。

老白在会上又说：“免除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是有程序的，是写在党章上、党的决议上的。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的，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选举的。解除他的职务按说必须由中央全会决定方可生效。所以，我以为17位老同志开的民主生活会，不能代替全会的决定权力组织。”

他说的有理有据，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表达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坦荡胸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成熟，因为她有无数像白振亚那样敢于维护党章的忠诚儿子，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敢像老白那样说出来罢了。

老白讲话之后，会场一片安静。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拥护。沉默等于默认了他的观点，变相肯定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举动。“政治大案”之说，自然不了了之。

他在另一次会上说了一个党员的不同意见，也被人视为“反对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定”。虽然时隔19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6年，时任安徽省嘉山县委副书记的翁永曦正面临一场政治灾难。他原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时只有28岁，是我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对当时的赵紫阳总理说：一、希望中央收回对我的任命；二、如果坚持用我，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现在我是个青年，不要因为提拔使我成为坏小子。大意如此。这是翁永曦亲口告诉我的。不到两年，所说的后两条不幸而被言中。开始，他被下派到安徽省凤阳县任第二书记，因为他清正廉明，关爱百姓，被凤阳百姓称为“翁青天”。在嘉山，他的公

仆精神不变,创办了第一个股份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给县里的不少企业带来效益,但翁分文不取;他提出“搭台唱戏,干部分流”的改革方案,全地区创办了数百家企业。翁永曦成为滁县地区乃至全国公认的改革开放带头人。

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晴天一声霹雳:中央整党五人领导小组建议开除翁永曦的党籍。安徽省委常委会做出决定: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开除翁永曦的党籍。省纪检委负责同志携带中央五人小组的函件和安徽省委的决定,以及翁永曦错误的调查报告,在滁县地委委员会上照本宣读。

作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白振亚,对此决定感到十分愕然。他清楚记得,调查报告列举了翁的三大罪状:

一、翁在读高中时,参加了红卫兵,学校里有位教师受批斗与他有关。

二、翁下放到某生产队,想当队长,有“篡党夺权”之嫌。

三、翁写过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仅此三条,便对一个党员干部判处政治上的死刑。这是罪状吗?如果依此定罪,全国恐怕有上百万、上千万这样的“死刑犯”。

主持会议的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当场表示说:“我们都造过反,批过邓嘛!”言下之意,大家都是政治上的“死刑犯”。

会议要求每个委员都要表态,白振亚自然不能幸免。他表示三点:

一、组织上服从。

二、认识上保留。翁永曦是个好党员。他在文革中还是孩子,是红卫兵响应红司令“造反有理”的号召,没有迫害过任何人,即使有过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谅解的;翁永曦是个好干部,他的公仆精神,立党为公的行为十分可贵,政绩卓然,众口皆碑。

三、在程序上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开除党员的党籍,照党章规定,应经党小组讨论,党支部决定,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批准。现在对翁永曦从上而下指定和决定开除他这个党员党籍的做法,是违背党章的。可能是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

老白的发言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挽回翁被开除党籍的事实。18年过去了,也许翁本人已不再提起,但老白没有忘记,他说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为真理而呐喊、呼号。于是他致信五人小组的负责人×××(翁案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要求为翁永曦讨回公道。

这封信是2004年10月发出的。

2005年元月3日,老白又追一信,言词有些不恭“……不论哪种情况,(不回信)都是对民间来信的一种轻视,都是对以人为本和公民权利的侵害。”他再次要求×××对翁案有个明确的态度。最后,老白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不会就此息鼓。待到我得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将自费赴京上访,向当权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负责人呼吁,直到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为止。”

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呼一声:好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硬汉!

(责任编辑 杜晋)

(此文原载2005年7月7日《市场经济内参》,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选择健康——最小的投资,最大的回报

大理由订阅《中老年保健》

- 创刊20载
- 权威专家
- 正确保健
- 倡导理念
- 个人经验
- 关爱父母
- 自订送人
- 备查备用

精益求精
篇篇倾情
长寿经验
科学养生
一吐为快
孝心一片
温馨首选
蔚为文库

全彩印刷



“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刊物
首届卫生部医药期刊优秀期刊奖

邮发代号:
82-221

价格:每月5.2元 全年62.4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北口中日友好医院内
邮政编码:100029
订阅热线:010-64284311 84205154
传真:010-64206649

“编外”地下工作者

● 姚 强

我的母亲李玉盈,1903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与我父亲姚继鸣结婚。姚家系汉旗人的后裔,清王朝覆灭后,家境开始败落,举家移居到姚家祖坟所在地京南姚家坟村(现属十八里店乡)。母亲来到这个家庭,便承担了沉重的家务,默默地履行做儿媳、妻子的“职责”。当时父亲在城里一家印书局里做工,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36年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对于父亲思想和行动,虽不完全理解,但以她纯朴的理念,相信丈夫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毫无保留地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此时,姐姐姚明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了抗日根据地,母亲更是奋不顾身地支持协助父亲的工作,许多往事,至今不能忘怀。

拐棒胡同“遭遇战”

1930年,我们举家搬到西城按院胡同17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1934年以后,母亲膝下已有了我们一女三子(姐姐姚明,我和姚坚、姚立)。后来,按院胡同17号不仅是全家生活的地方,还成了抗日情报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秋,我父亲姚继鸣受命回到北平,开展和领导军事情报工作。在一个夜晚,父亲敲开了按院胡同17号的大门。母亲见丈夫归来,既惊喜又有几分疑惑,不久,对于父亲这次回京的使命,逐渐有所了解。母亲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有人问到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做买卖”的;要问到你爸爸在哪儿,就说“不知道”。在建立了“北平情报站”后,父亲充分利用了北平的社会关系。除了按院胡同外,还有老

家姚家坟,广渠门外南杨庄二姑家,都是地下工作人员人员的避难所和情报交换点。母亲经常以串亲戚为名,往来这些联络点之间,协助父亲传递情报。

在敌人眼皮底下搞情报,是以生命作代价的。稍有疏忽,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每遇险情,母亲总是首当其冲,掩护父亲。父亲有位挚友南汉宸(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北京前拐棒胡同有一所颇为讲究的四合院,当时南汉宸夫妇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房子落入了日伪当局手中,住着一位自称“沙太太”的人。1943年初冬的一天,这位沙太太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声称急待与南汉宸的夫人王幼兰见面,有要事相商。父亲看了这则启事萌生一个想法:马上去见沙太太,以南汉宸好友的名义,代为接管这所房子,作为我军在北平的情报中心。此话一出,就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对父亲说:“你知道姓沙的是什么人?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你不是自己送上门了!”父亲执意要探个虚实,母亲断然表示:“要去也得我先去,你不能露面。”第二天母亲便去了前拐棒胡同,开门迎接的正是那位“沙太太”。一听我母亲说认识王幼兰,脸一下沉了下来,两眼盯着母亲上下打量,连珠炮似的提了一大堆问题。弄得母亲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说:“我和王幼兰也不太熟,只是来看看房子”。沙太太问:“你叫什么名字,”母亲脱口而出:“我叫李玉盈。”急忙转身走了。没过几天,报纸上又登出了沙太太的启事,这次是寻李玉盈,希望再次“面谈”。父亲感到事情不妙,又以李玉盈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则声明:“不认识沙太太。”结果是越抹越黑,证实了敌人的怀疑。事发后,父亲立即转移到天津,不久母亲便在家被捕,关在东城区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

面对日本人和汉奸的“审问”,母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母亲心里明白,敌人抓她来的目的,就是想弄到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以自己是家庭

妇女为由,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更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日本鬼子和汉奸软硬兼施,轮番追问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三个字“不知道!”在牢中,与母亲同室的还有一位辅仁大学的女学生,被捕后很恐惧,整天以泪洗面。母亲对她说:“闺女,别害怕,你爱国有什么错?他们审问你时,什么都别说,他们对你没办法。”这位女同学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母亲经过多次审问,敌人什么也没问出来,我表哥李明(时任日伪政权要职,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内线)知道此事后,给日本宪兵队打电话说:“李玉盈是我舅母,是个家庭妇女,你们抓她干什么呢?”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母亲,随之被释放了。当我们在家中见到母亲时,她神情憔悴,但还是那样平静,在生死关头,她掩护了父亲,也使党的地下组织避免了一次损失。



1934年,姚继鸣、李玉盈与女儿姚明合影

按院胡同开粉房

1946年4月父亲调回解放区,到二野任职。北平的工作,由原前总情报处的李成(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局长、广州市纪委副书记等职)接替。父亲走了,母亲仍“坚持阵地”,按院胡同17号仍然是地下工作人员的落脚点和联络点。这时的北平已是国民党统治区。李成和夫人申小丛(原全国政协秘书长申伯纯的女儿,曾任广东省医院党委书记)来到北平后,很快与我母亲取得了联系。第一次见面时,母亲得知他们刚完婚不久,非常高兴,对小丛说:“刘先生(李成的化名)是个大好人,你们成了亲,真好!”

从此李成夫妇与姚太太(他们对我母亲的尊称)时有来往,并继续利用我父亲、母亲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谁知,国民党特务跟踪上了我母

亲,发现了李成夫妇的住处。1947年2月17日夜李成被捕。母亲得知后,又怒又恨,焦急万分。她知道李成的被捕,肯定是有人告密。敌人还会找麻烦。不出所料,申小丛的住所被特务监视起来,并闯入院内不停地进行威胁、追问,拿枪对着小丛问“有什么人来过你的家?”小丛冷冷地回答:“没有人来。”而这时申小丛已怀孕六个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母亲得知后不顾一切地直奔小丛的住所,一进门,只见过来两个陌生人盘问,母亲见势不妙连说:“走错了,走错了门!”转身离去。过了一个月,敌人在审问中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监视小丛的特务

悄然撤走。申小丛由于受到折磨,精神极度紧张,造成了早产,生了一对龙凤胎。出院后,国民党特务又来骚扰。这时母亲又一次来到申小丛身边,安慰小丛说:“不要怕,他们(特务)抓不着证据,不敢对你怎样。”又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两个孩子受委屈!”在母亲的坚持下,将她们母子、母女三人接到了按院胡同17号。这时母亲又请来我的表姐杨润英帮忙。娘俩既要伺候小丛做月子,又要喂养两个孩子,女孩李平、男孩李安由于先天不足,身体极为虚弱。特别是男孩,简直就是皮包骨,三天两头要上医院。这可累坏了母亲和表姐,母亲终于病倒,痔疮严重脱肛,走不了路,申小丛见到此情此景,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喊道:“妈妈!你为我受苦了!”

1947年10月,李成入狱八个月之后,敌人对李成的“审讯”一无所获。李成坚持自己是在北平做买卖的商人。无奈,敌人只好判定“取保释放”。李成出狱后,认为自己有条件继续以商人的身份坚持下来工作,并以姚太太的关系掩护自己、迷惑敌人。他向母亲提出,想在按院胡同开个粉房作为掩护。当时母亲听了一愣,觉得这么一搞目标更大

了,又会引起特务的注意。李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他经过入狱几个月,敌人似乎也确认他是商人,开粉房做买卖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母亲觉得也对,便将三间东厢房和二百多平方米的后院腾出来,红红火火地开起了粉房,前院做粉条,后院养猪。李成穿起长袍,当上了粉房掌柜。这时特务来到按院胡同17号,看着进进出出的“买卖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成充分利用这个“掩护所”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不久申小丛被华北中央局城工部派人接回了解放区。当时只抱走了女儿小平,而体弱多病的男孩小安则留给了母亲代为抚养。

对于李成夫妇的男孩子李安,可以说母亲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呵护、养育了这个孩子。并且奇迹般地将他从体弱多病中挽救过来,成为健康的孩子。面对特务的寻衅,母亲大义凛然说:“只要有我在,你们就甭想动一下孩子。”

母亲一直将李安抚养到6岁,1953年当时在广州任职的李成夫妇将李安接走时,孩子哭喊着:“我不走!我要姥姥……”在按院胡同17号的大门口,母亲含着眼泪,送走了他们全家。此后,出生在北京的李平、李安,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广州。

“文革”中继续保护同志们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年近古稀,做了一辈子好事的老母亲,竟遭到灭顶之灾。我的两个弟弟姚坚和姚立,都是在革命家庭熏陶和党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但在那“造反有理”的狂潮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他们不服,痛斥那些造反派的“愚昧无知”……结果矛盾激化,两人都被迫害致死。母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勒令每天下楼去扫马路。就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强忍老年丧子的悲痛仍以其微薄的力量,照顾保护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

母亲晚年的遭遇是她始料不及的,但面对一些扭曲愚昧的言行,她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当时,除了扫大街之外,还要接待那些“革命组织”的外调人员,无非是调查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同志的“历史问题”。当老人家听到她所熟悉的名字时,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她反问调查人员:“你们

要问什么?不说他是叛徒吗?”有一次“外调人员”向我母亲调查一对曾在北平做过情报工作的夫妇,他们是我父亲在1942年通过内线安排在伪治安军内搞情报工作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曾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投进了监狱。母亲听了这个情况,显得有些激动,她脱口而出:“他们怎么了,那个时候不打入敌人内部能得到情报吗?”“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是共产党的人,别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平反后,特地来看望了老太太。

“四人帮”倒台后,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百业俱兴。1988年中共中央调查部为收集编写抗日战争中情报工作史料,指定林一同志(原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建国后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等职)组织申小丛、赵勇田(原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长、军旅作家)等同志专门收集、整理姚继鸣领导的北平情报站这段历史资料。父亲早已辞世,母亲则是为数不多的健在的历史见证人。母亲对编写组同志的来访,非常热情,如数家珍地讲述了当年那些人和事,为编写组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林一同志、中调部的负责同志多次看望老太太,对她表示感谢,对她在抗日战争情报工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物质上,她没得到过任何报酬,对此,她很坦然。

家人为老人家立了碑

1986年,在她83岁高龄时,不慎摔伤造成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在病榻上,她的心态仍那样平和,仍是那样热心关心后代们。在晚年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身上。孙辈们也很孝顺,经常来看望奶奶(姥姥),这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候。1990年前后,几个孙子、孙女相继出国留学。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心里很明白,孩子的离去意味着什么。每当我送走了一个孩子,都强忍着伤感,嘱咐他们“一定回来看奶奶。”当我从机场回到家中,看到老人仍在默默流泪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

1993年2月16日凌晨,我的母亲李玉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90岁。

(责任编辑 吴 思)

黄天和他的尖兵剧社

● 刘力勤 苗淑云 宫洁民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冀察热辽遵化县一个名为杨家峪的小山村，一直流传着黄天壮烈殉国的动人故事。杨家峪有位名叫丛砚堤的鼓书艺人，每当附近有庙会，他就登台演唱京东大鼓《颂黄天》。这段鼓书词是这样唱的：“说的是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有位年轻社长叫黄天。有一次演出闭幕正往驻地赶，被鬼子包围情况好惊险。他两次冲回杨家峪，转移战友得安全。最后敌人已逼近，他用仅有一粒弹从容自尽，鬼子兵看了个个心胆战。后人齐声来赞叹：一位民族气节好社长，自创了艺术人生的辉煌灿烂！”

黄天（1907—1945），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庭材。江苏崇明县（现为上海市崇明县）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昆虫局图书馆主任。自幼好学，尤其喜文艺。1935年在杭州组织三五剧社自费排演《湖上的悲剧》、《雷雨》等戏，改编过《打渔杀家》、《尤三姐》等剧本，并为杭州一家日报编辑过《戏剧周刊》。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奔赴革命圣地，是年11月入陕北公学六队学习。1938年8月任陕北公学剧团团长。翌年7月该剧团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鲁艺部分师生合并，成立华北联大文工团，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赶排了《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深入前线阵地慰问，受到军民欢迎。1941年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此间，曾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1943年8月，奉命调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尖兵剧社任社长。

1943年8月，为加强对冀东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黄天调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刚刚组建的“尖兵剧社”任社长。在“尖兵剧社”

期间，他努力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火热的抗日斗争服务的方针。几年间，他们跟随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过滦河跨燕山越长城，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行动，足迹遍及冀东平原和长城内外。剧社成立一年间，在累计行军3600余里，分散到连队七个月的情况下，组织了83次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还创作剧本58个，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三期，《尖兵歌集》六集以及连队、乡村学校使用的大量文娱材料。形势相对好转之后，剧社不管走到哪里，往往一搭台，方圆几十里的老乡便潮水般涌来。1944年7月在丰玉遵联合县境内的一次演出，观众竟多达万余人。连当年被营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看了“尖兵剧社”的演出以后，也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连连称奇。

黄天的创作成果极其丰硕，作品中有反映冀东人民在铁蹄下痛苦生活的《满洲泪》、《沟线上》、《抓壮丁》，有歌颂军民斗争和鱼水深情的《拥军模范于平》、《前门后户》、《夜深人静时》等等，还配合形势创作了大量歌词。他始终将火热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那时剧社几乎天天要改换宿营地，每到一村，他至少要访问自己的房东。每接触一个新的部队，他都抓紧机会与干部战士谈话。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和群众既朴实又形象化的语汇，有时睡到半夜还起来点上小油灯追记。为了创作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他背上米袋和背包，先后两次跟随部队跨过长城去热南辽西一带，深入像史前期一样荒寂的“无人区”体验生活。在那里，他看到“人圈”中的乡亲们，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仅有的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十来岁的孩子，冬天吃在火旁，睡在火旁，被

火烤风吹得全身起了鳞片,黑得像乌鸦一样。这一切,使他无比的痛苦和忿恨。他与部队一起露营热南的大山中,跟战士们一起捡松枝做饭。一天,他和战士们一起看到一小块向阳的山坡上,有一个盖酱缸的大草帽。揭开一看,下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告诉战士们,她的儿子在八路军十二团当机枪班长,她决心与儿子共同坚持抗战,誓死不进“人圈”那人间地狱,宁愿一个人进深山住山洞,老妈妈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那一小块向阳的山坡,是她白天惟一取暖的地方,她的大草帽是为了遮挡来不及躲避的风和雨。她一个留下来等八路军打回来,等到解放,再过人间生活。黄天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群众一起穴居野外,忍饥受冻,回来时只剩下空心棉袄,单衣和干粮都送给了苦难中的乡亲们。从长城外回来后,他以“人圈”中的乡亲们生活为创作素材,用不到两周时间,完成了他的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

《地狱与人间》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绝笔。

国内研究“无人区”问题的专家认为:《地狱与人间》是“无人区斗争的一部史诗,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历史研究难得的资料,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

1945年7月3日,奉军区首长之命,“尖兵剧社”与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的部分演职员共60多人,在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等率领下,由遵化县支队一个加强排护送,开赴玉田,参加军区召开的“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并准备演出黄天的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今歌作曲)。

队伍从迁安团汀出发,穿越平(北平)唐(唐山)公路,跋涉百余里,一直走到深夜。因人



黄天

困马乏实在难以坚持,才山临时决定,部队在距原定宿营地鲁家峪15公里的杨家峪宿营。进了村,黄天将“尖兵剧社”的同志们一一安顿之后,又专门来到村东头杨大娘家,亲切看望“尖兵剧社”的同志们,还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稿费从房东家给他们买了水果,直至午夜,才回去休息。

天将拂晓,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700多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将村子团团围住。为组织队伍突围,黄天两次冲入村中。大部分同志脱险了,但才山、黄天、今歌等十几名留下掩护的领导和同志,却被敌人

重重围困在村中,再无突围的希望。包围圈步步紧缩,劝降声、叫骂声喧嚣一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恪守不渝的崇高信条,对于黄天这位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有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之后从容饮弹。时年38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就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四十一天前,只有四十一天哪,我们可敬的黄天和众多的烈士们,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这个浴血八年久久盼望的这一天,和他一起生活和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感到十分地痛心。

黄天一生热爱戏剧,为了文艺队伍的建设,他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然而,就在黎明将之时,他却英勇而从容地牺牲在战场上,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之火实践了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理念,为后人,特别是为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责任编辑 致中)

更正

本刊2005年第9期第16页图片说明中的年份应为“2000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谨向读者致歉。

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

● 王伯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派远征军十余万人入缅协防失利,部队退入印度后又在印度补送兵员,组成驻印军新一新六两个军5个师,在英、美盟军配合下反攻缅甸,节节胜利,解放缅甸北疆土14万平方公里,并在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协同作战下新建并打通中印公路1736公里,新建中印油管2960公里,毙敌18万之众,战果辉煌。

印缅战场是二战中中国军队参加国外作战并作为主力的唯一战场,对二战盟军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不论在台湾或大陆,很少有人提起这场战争。作为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借此二战和抗日战争60周年胜利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

二战中国战区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日寇也乘机压迫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总督要求登陆。7月2日,日军占领广西龙州、镇南关,8月6日登陆海防,中国军队旋即破坏滇越铁路,防止日军进犯云南。8月30日,日军与法国维希政府订立协定,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9月,日军即分三路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自此,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即被日军截断,滇缅公路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积极出兵南下。次日,日军强行进驻泰国,泰国政府被迫与之签订城下之盟,并对英、美宣战。12月14日,日军即由泰国进攻缅甸,31日攻占缅甸第二大海港毛淡棉,威胁仰光。日军另外的南

进部队于1941年12月25日攻占香港,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仅只两个多月时间内囊括了东南亚大片土地,气焰十分嚣张。

在盟国方面,也迅即作出了一系列应战的积极反应。珍珠港事件之次日,中国即向日本正式宣战,紧接着英、美亦相继对日宣战,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中、英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2月31日,罗斯福提出成立中国战区,包括泰国和越南,由蒋介石任战区统帅,并派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等职。

中国远征军入缅

1941年底,中国已经准备派遣10万部队入缅协防,但由于英方心怀鬼胎,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影响他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因而一开始就拒绝,或者拖延阻滞,中方两次动员军队入缅,皆被拒而作罢。直至英缅军队在日军强力攻势下土崩瓦解,仰光危急之际英方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令组成远征军,由卫立煌(后罗卓英)、杜聿明分任第一路正副司令,下辖第5、6、66三个军入缅御敌,并优先运送第5军入缅。先头部队是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驻地在云南保山。3月2日起由保山陆续向缅甸开进,到腊戍后换火车,日夜兼程,千里跃进,深入缅甸,于3月7日到达指定地点、南距仰光250公里的同古集结,阻敌北窜,而第二天,仰光就被日军侵占了。当时英印军队战斗力极弱,慑于日军威力,丧失斗志,表面上要和中国军队共同防御缅甸,骨子里则是执行英政府“弃缅保印”的方针,急忙要向西北撤退至印度,和日

军一触即溃,常常要靠中国军队急驰救援保护。

仁安羌大捷 震惊世界

4月15日西线英军一路不战,退到缅甸中部最大工业城市仁安羌(盛产石油),并炸毁油田。这时日军33师团急追直进,越过仁安羌,把英军第一师七千余人悉数包围。英缅军总司令亚力山大急向中方代表侯腾和蒋介石请求接应。16日,被围英军水源断绝,师长斯考特再次呼急,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令新38师布防,相机援救英军。113团当即乘卡车急驰救援,孙立人赶往亲自指挥。17日黄昏到达仁安羌城郊宾河北岸,进入战斗。次日拂晓,猛攻宾河北岸日军的主阵地。经过一个上午血战,北岸日军尽被歼灭。次日凌晨4时30分,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孙立人派113团分几路在夜幕中渡过宾河进行突然袭击,并派多股小部队深入前线,设置疑兵,穿插袭扰,使敌不知我军虚实。这样,在我军巧妙周全布置,勇猛战斗下,敌军被分割成小块,到下午3时,主力全被击溃。5时,残敌亦被肃清,首先解救出被围英美传教士及新闻记者500余人。接着,英缅军第一师及战车营官兵7000余人、战马1000多匹,在113团掩护下安全撤至宾河北岸。孙立人命令将从日军手中夺得的英军战车和辎重汽车100余辆交还给英方。被围困三天的英缅军,激动万分,雀跃欢呼,有的把衣服抛向天空,有的抱成一团痛哭,很多人跑过来拥抱亲吻中国士兵,纷纷举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情景至为感人。

是役,孙立人以新38师一个团1000余官兵抗击并打败日军两个联队一万余人,解救英缅军7000余人,消息传到英国,朝野为之轰动。英国女皇特颁奖给孙立人“英帝国司令章”,这是英国最高荣誉军功勋章(CBE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亦专电祝贺,颁予孙立人“丰功员章”。国民政府颁发给孙立人“四等云麾勋章”。有功官兵,皆受褒奖。被解救出来的众多外国记者,亦以亲身经历报道了这一胜利的翔实经过。孙立人及中国军队的英名因而布扬天下。

兵败野人山

中国军队入缅后按照协议归英国指挥。3月6日,美国史迪威将军到重庆报到,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11日即飞赴缅甸。这时缅甸盟军有英、美、中三国将军指挥,却未能建立真正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防御指挥系统。“最高指挥”的英国一心想的是把中国军队推到第一线去掩护他逃跑,有时甚至假造军情,让中国军队主力急奔西线,到时却无敌踪又返回东线,来回空跑折腾,贻误战机。中国军队仓促入缅,后续部队运输工具不足,到腊戌以后火车效率低下,并频遭缅甸破坏,一些部队要靠徒步行军奔赴前线指定位置。面临日本空军和机械化陆军部队的强劲攻势,既要派兵到西线掩护英军撤退,又要在中、东两线阻止日军进攻,战线辽阔,兵力不济,后援不及时,捉襟见肘,多次会战计划都告流产,而且东线防务薄弱。日军窥破了这一点,于是组织重兵,3月下旬将新调来缅甸增援的36师团投入东线发动进攻。4月6日,日军攻占毛奇,20日攻占罗依考,24日攻陷雷列姆,29日即攻占我军入缅后第一军事基地、滇缅公路缅甸终点腊戌,截断我军回国归路,这就使我远征军全线动摇,不得不全面撤退。



孙立人将军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前线观察战况

日军乘我后方空虚,组织精锐快速部队乘势由腊戌沿滇缅公路向东急进,5月3日连陷八莫、南坎,侵入滇西边境重镇畹町。4日连陷芒市、龙陵,5日抵怒江西岸,由于我后方部队赶到将怒江上的铁索桥惠通桥炸毁,才被阻于怒江西岸。此后日军继续于5月8日占领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10日占领我滇西重镇腾冲,第一次缅战历时两月即以我方全面失利告终。

撤退时远征军指挥部正、副指挥史迪威、罗卓英决定向西就近撤入印度,杜聿明经请示重庆,率主力部队北越密支那夺路回国。但前锋未到密支那,获知那里早被日军占领,乃决定向北撤入野人山,再向东寻路回国。

当时第5军200师正由西线调回东线反攻棠吉,经过激烈奋战,于4月25日收复了棠吉,但26日即奉命主动放弃棠吉,向北尾追北犯腊戌之敌。腊戌陷敌之后仍奉命继续北上追赶第5军主力,这需要通过敌军的多道封锁线。5月18日夜,当通过西保—摩谷公路时,受敌伏击,伤亡惨重,师长戴安澜不幸身负重伤,突围后5月26日因伤重不治在茅邦村殉国,时年36岁。部队经过副师长尚吉人等带领继续突围,终于6月17日到达腾冲附近渡怒江回国。同时第5军96师

也北撤到孟拱,继续北上到孟关,进入野人山区,入滇回国,沿途病饿拖死者6千余人。

杜聿明亲率第五军军直属部队,新22师,以及远征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等3万余人5月10日于军部所在地北撤。13日过曼西以后,即离开道路,徒步进入野人山区原始森林。野人山是中国史、地书上的名字,缅甸叫那加山,在缅甸西北与印度交界,纵深200多公里,横宽100多公里,海拔2600米以上,山上是参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没有人烟,难见天日,亦无道路,地面是多年积累形成的一层很厚的枯枝落叶腐

殖层,滋养虫豸。最为独特的是蚂蝗和蚊蚋,遍地皆是,无孔不入,吸人血,又传染疟疾等疾病。偶尔在密林中间出现一小块无林的开阔地,面积一般百余或数百平方米,则长满一人多高的草,内藏野兽蛇蝎。当地土人视为“死地”、“绝地”。大部队入山以后,汽车、大炮、重武器、辎重,全部烧毁,避开敌军的追堵和被其封锁的道路在密林中开路前进,经常方向迷失,惟赖指北针指引,辗转回还,在森林中盘旋了两个来月,又无粮食医药补给,疫病流行,病饿死者数以千计,杜聿明本人也患伤寒病由担架抬着行进。直到7月上旬才摸索到胡康河谷的新平洋附近,7月10日被美军一架侦察机发现,返回后向已先期撤到印度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报告,孙立即组织一支包括医务人员和担架队在内的约六七百人的营救部队翻越那加山,进入胡康河谷,往返500多公里,前往接救到印度,此时原来9000余人的新22师只剩下一千余人了。

北撤时新38师奉杜聿明命殿后,待主力安全撤出后再北入野人山,追上主力。该师既要保护西线英军安全撤入印度,又要保护中线我军大部队安全撤入野人山,待全部都安全撤退后,已是孤军陷于敌寇重围之中,师长孙立人反复考

虑,北撤是绝地,数百里渺无人烟,也无路可走,无粮草医药供给,无异自取灭亡。东归之路已被日军切断,只有按原来罗卓英之命,西撤印度才有生路。孙军一路边打边撤,终于5月27日到达印度英帕尔附近,为国家保存了一支8000余人的完整之师,成为后来反攻缅甸的主力。

蓝姆伽练兵 筹划反攻和修建中印公路

早在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到达缅甸之后,4月16日他就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不久缅战失利,5月24日史迪威退回印度,5月26日就又向蒋介石提出在印训练中国军队十万人的计划,以反攻缅甸,打回中国。6月15日再次提出,多次商讨,终获蒋同意,增送2.3万兵员到印组训,训练地点经史迪威和英印总司令韦维尔商议,定在比哈尔省一个小镇兰姆伽。已经由缅甸撤到印度的新38师和新22师官兵9000余人于8月26日正式开始训练,以后陆续补充,这些部队随后改组为中国驻印军,又称X部队(X-force),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后郑洞国)任副总指挥。滇西方面,1942年6月以后,怒江防线稳定,与日军形成隔江对峙局面,随后驻滇部队组成滇西远征军,又称Y部队(Y-force),由宋希濂(后卫立煌)任总指挥,也积极补充美式装备,进行训练,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滇。中印公路修建的计划也同时提了出来。

经过史迪威与韦维尔多次商讨,双方最后协议,以雷多为反攻缅甸和修筑中印公路的后方基地。筑路的技术工作由美国工兵部队承担,英印政府负责招募印度劳工协助美国工兵作业。史迪威先后把美国工兵45工程团、3302团、第823航空工程营、和中国驻印军工兵第10团、12团调集到雷多,加上印度、尼泊尔和我国藏族劳工总计达7000余人,组成了一个多国、多民族的机械化筑路大军。1942年12月10日正式破土动工修路。1943年1月20日起开始24小时轮班作业,趁旱季气候干燥,加快进度,以日平均3—5公里的速度前进。终于2月28日越过印缅边界,推进约70公里。这一天是滇缅公路枢纽腊戍

失守10个月,筑路部队举行了纪念仪式。

中国驻印军反攻进入野人山区

1943年1月27日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任前敌指挥官,率114团由训练基地兰姆伽抵雷多,掩护修路。二月底筑路进入缅境后,即进入了野人山区,野人山的险恶自然条件已见前述。盘踞在那一带的是日军18师团,原名久留米师团,七七事变后侵占杭州湾、上海、南京,以后又进犯广州、南宁,作恶多端;太平洋战争后又进占越南,后调缅甸,为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有常胜军之称,经营缅北防务已一年有余,在各据点周围利用森林、河流等有利地形地物构筑机枪巢堡。还有专门的狙击手三五人为一小组,零星分散隐藏在树顶上,观测军情,假学猿啼相互传递信息,并放冷枪,射杀我军来往人员,危害极大。在那里印缅边境原驻有英军一营一千余人,常受其袭击,伤亡甚众,正拟撤退,114团赶到后立即派一个连接防,向敌寇展开迎击,一连夺回几个山头,敌连夜增援兵力,经常来犯,皆被击退,伤亡过半,才不敢再犯。5月进入雨季,由112团替换114团,作为前锋,在5—10月几近半年的雨季里,在霖雨连绵、阴森蔽日、遍地泥沼的森林中,我军健儿扫除敌袭,克服艰险,砍树筑路,终于10月29日112团一举攻克新平洋,打开越过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的门户。至此,缅北战斗的前哨战宣告结束,就要展开对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争夺战了。12月27日筑路军司令皮可上校也将公路筑到新平洋,比预定的年末期限提前4天,由55辆卡车载运部队和物资由雷多开抵新平洋。由雷多至新平洋公路越过野人山,全长186.7公里,如期修通为以后缅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挺进胡康河谷

胡康河谷包括新平洋盆地和大洛盆地,长约110公里,宽约20—70公里,面积约为2800平方公里,都是一片原始森林,中间纵横密布着从野人山流淌下来的四大河流和许多小支流。从北到南,只有于邦、太拍家、孟关、瓦鲁班等几个较大的村镇,都是军事的重要据点,也是公路必经

之处。行政中心在孟关。

攻占新平洋后,我新38师112团即向下一个重要据点于邦进发,这是反攻缅甸战役的第一个攻坚战。起初,盟军指挥部情报不确,以为那里只有几个日本军官领着四五十个缅甸雇佣兵和土人在防守。几经苦战之后,才知是日军精锐的18师团的55、56两个联队的主力。我只有一个112团,兵力单薄,防线长达150公里,后援不济,第一营营长李克已亲率一个连前往第一线包围敌军,1月22日却被敌增援部队反包围。这时,在孙立人将军多次申请力争之下,盟军指挥部才同意他率113、114两团和炮兵2营前往增援,由雷多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到12月21日才赶到前线。23日剧烈的血战展开,经过七昼夜的内外夹击、艰苦拚杀,终将敌阵地摧毁,全歼敌55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官兵1800余人,我军伤亡官兵230余人,仅为敌之八分之一。这是一个虽然艰苦而却十分漂亮的攻坚歼灭战,初战大胜,打出了中国驻印军的信心和威风,打破了18师团“常胜军”的神话。在以后的多次战役中,孙立人将军充分运用了在原始森林中开路远距离迂回包抄的战法,多次克敌致胜。如在奇袭瓦鲁斑,包抄孟关一役中,突击敌十八师团司令部,战车营竟将其官防印信都缴获了,敌师团长田中信一落荒逃窜,仅以身免。此时新22师在廖耀湘将军率领下也参加了战斗。1944年3月15日,驻印军新22师攻克胡康河谷南端横亘的坚布山的北隘口丁高沙坎,胡康河谷战役经过4个半月的激战胜利结束,我军由新平洋向前推进了约100公里。

横扫孟拱河谷和攻克密支那

从胡康河谷越过横亘的海拔1300多米坚布山即进入孟拱河谷,越山隘路长达16公里,北隘口为丁高沙坎,南隘口为沙杜渣,道路狭窄,两旁山岭重叠,悬崖陡壁,树高林密,真有一夫当关,万夫难过之势,也是公路的必由之路。孟拱河谷南北长约100公里,宽仅16公里,河谷中居民较胡康河谷稍多,重要村镇有拉班、加迈、西通、孟拱等处。孟拱为行政中心,处于河谷南端,有铁路和公路东北去密支那65公里,西南通曼德勒、

仰光,为缅北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重镇,与加迈之间也有正规的公路相通。

我军攻占胡康河谷期间,日酋大本营觉察到打通中印公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对它的威胁,乃增调援军到缅甸战场加强防守。我驻印军新38师和新22师健儿,在3月中旬扫清胡康河谷残敌之后,3月下旬立即挥师南下,仍然多次运用远程迂回奇袭的战术,克服地形艰险,雨季汪洋,守敌顽抗等诸多困难,终于连克沙都渣、拉班、加迈、西通等要地,于6月25日攻克了孟拱。

早在4月下旬,史迪威为早日打通中印公路,已将刚刚从中国补充到缅北战场的新30师88团、50师150团,加上美军第5307支队(麦里尔支队)组成中美混合突击队于孟关集结,东南沿库芒山而下,奇袭密支那,5月17日一举袭占了密支那飞机场,转向攻城。由于盟军指挥失当,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得能增援顽抗,攻城陷于胶着的攻坚战状态中。我军攻占孟拱后,密支那日军赖以补给和南逃的孟密铁路和公路完全切断,军心动摇,新38师迅速沿孟密铁路和公路扫荡前进,于7月15日与围攻密支那的新30师会师,8月5日密支那完全攻克,反攻缅北第一期战役宣告结束。

密支那攻克之后,驻印军利用雨季休整两个月,除原来的新38师和22师外,加上后调运到印缅战区的14师、30师、50师共5个师编成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任军长。10月15日雨季过后,驻印军开始第二期战役,向八莫以南进军。这期间,史迪威于10月18日被召回美,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由魏德迈继任,印缅战区总司令由索尔登继任。

日军进攻印度英帕尔

早在二三月间我驻印军扫荡胡康河谷时,日军就策划进攻印度英帕尔,以攻为守,牵制我军行动,妄图重复两年前的急袭腊戍,切断我军后路的故伎,拟切断加尔各答至阿萨姆、雷多地区之间的公、铁运输线,使驻印军再度陷于后援断绝的境地。日军纠集了三个师团的兵力,于3月8日起开始实施代号“乌”的作战计划,企图速战速决,于5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结束战斗。日军

以一部先直逼英帕尔，吸引英军主力，另一部随后奔袭英帕尔之北约100公里、英军防守单薄的科希马，并于4月6日轻易攻占。科希马距迪马普尔只有50公里，那里是加尔各答—阿萨姆铁路上盟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军备、物资极多。印度是英国在南亚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地，素有“英国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之称。日军这次进攻真触动了大英帝国的神经，他再也不能像两年在缅甸那样弃地逃跑了，从英印14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到英首相邱吉尔和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都慌了手脚，赶忙采取紧急措施，从各地空运援军到那里加强防御，总计调集第7印度师、第5印度师、英军第33军等，连原有部队共达十万人。史迪威也将中国驻印军预备队新30师由缅北调回印度驻守第马铺、曼尼坡一带铁路线，并于5月间发动对密支那的远程突袭，牵制日军。同时邱吉尔并通过罗斯福向中国政府提出滇西远征军向缅甸发动进攻的要求，先后达四五次之多，最后甚至提出“如不发动即将停止美援”相威胁。5月11日我滇西远征军开始于7处强渡怒江，向守敌发动强攻，直逼松山和腾冲龙陵。缅甸日军在这样八面受制的情况之下，无力对犯印日军进行增援，英帕尔局势才得以稳定下来。不久雨季到来，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在英军增援力量打击之下，疲惫难支，损失惨重，伤亡达5万余人，终于败退，于7月10日起撤回缅甸。这次战役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英国增加了驻印缅的军事力量，为来年(1945)夏由印度英帕尔向缅甸中部反攻打下了基础；第二、中国远征军由滇西发动反攻，与驻印军向孟拱河谷和密支那进军同步，为两支部队同时打到滇缅国界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新六军调回国内战场

日寇为了牵制我驻印军和远征军向缅甸的反攻，同时解救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军严密封锁阻滞的困难，1944年春在大陆纠集了六



史迪威与孙立人(左)、廖耀湘(右)讨论作战计划

十多万兵力施行打通从东北直到华南陆上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从5月下旬起连续攻陷洛阳、长沙、衡阳，11月10日连下桂林、柳州，进逼贵阳。国内战场形势危急，重庆政府急调新六军回国。新六军在攻占八莫西侧之瑞姑后，即率第14师、新22师于密支那集结，于12月中旬起空运回国至湖南芷江。此后缅北战场完全由新一军三个师(新38师、30师、50师，后者原属新六军，现划归新一军)承担。原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返国，新任的美索尔登司令长驻重庆，以后缅北军事即全由孙立人将军指挥。

南下八莫、南坎，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会师芒友

密支那距八莫216公里。新一军担任正线主攻，自10月15日开始南进起，沿途艰苦奋战、夺关斩将，于11月下旬逼近八莫市区，展开了围歼攻坚战，终于12月15日攻克八莫，毙敌酋原好山大佐以下官兵2460余名，缴获战斗机2架、坦克8辆和大量枪械。为纪念此一战役的伟绩，后来盟军缅甸当局把密八公路的八莫—莫马克段取名为孙立人路，八莫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取名为

李鸿路(李鸿原为新38师114团团长的密支那组编后升新38师师长)。围攻八莫的同时,新一军已分兵向东南挺进,于1945年1月15日攻占临近滇西国界的南坎。随即由114团穿越老龙山森林向西南开路秘密前进,于1月26日一举袭占滇缅公路130公里路碑处一带路段,使驻守芒友、畹町一线日军后路切断,全线动摇,死守意志顿告瓦解,1月27日我113团即攻占芒友,同日我滇西远征军也攻占畹町。芒友、畹町各为滇缅公路缅、滇境内的最后一站,处于中、缅国界的两侧,中间相距28.3公里。到达芒友之后路线就接上了原滇缅公路,于是中印公路就全部打通。28日中午我驻印军新一军孙立人将军和滇西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将军即在芒友举行隆重的会师典礼,有印缅战区总司令索尔登等将领由重庆专程前来参加。接着下午就赶往畹町举行中印公路通车典礼。早在1月12日即已在雷多组成并驶来的包含120辆满载汽油军火等物资的大小车辆的车队由芒友浩浩荡荡跨过国境,到达畹町,车头上都悬挂中美两国国旗。重庆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专程前来主持会议,蒋介石也于当天发表了广播演说,宣布以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以纪念他在策划、打通和筹建这条公路所作的杰出贡献。次日,车队沿原滇缅公路向东前进,经过7天于2月4日到达昆明,受到数千群众挥舞彩旗热烈欢迎。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代表中国政府接过这批物资,并向领队皮可少将赠送一面绣着“胜利之路”四个大字的锦旗,以酬谢他指挥建成中印公路的功劳。

与此同时中印油管也建成通油,中印陆上通讯线路也建成通话。

南下腊戍 中英军队会师乔梅 缅战胜利结束

芒友会师之后,新一军立即分兵两路南下,东路直扑腊戍,中路直扑西保、乔梅,这里英军正从印度越钦敦江东进。由于日军主力早已被中国军队吸引到东线,西线防务薄弱,都是残兵败将拼凑起来防守,兵员和装备都不足,因而使西线英军能顺利向东推进。3月8日我军攻占腊戍,

16日入占西保,继续向西,与英军形成东西夹击曼德勒之势。3月20日英军进占曼德勒,30日即和新一军在曼德勒东北120公里的乔梅会师,至此驻印军反攻缅北任务胜利完成,以一部驻防西保、腊戍地区,大部集中密支那和八莫休整,准备调回国内战场。

曼德勒克服之后,缅甸整个北部东部有驻印军驻守,英军无后顾之忧,故兵力可以全部挥戈南下。原以为南缅日军会收集残部作困兽之斗,将仰光会战拖到雨季来临之后,而实际上日军从北缅败退下来之后,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兵无斗志、将无战心,真所谓兵败如山倒,再加缅甸人民抗日起义运动频繁。3月27日以昂山为领导的缅甸国民军举行正式武装起义,和各地游击队联合起来,声势浩大,使日军后方处处吃紧,终于迫使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部于4月23日撤出仰光,向泰国逃窜。5月1日国民军即解放了仰光,两天之后,英国海军两栖部队才进入仰光,再三天之后,5月6日,北线英国陆军先头部队才挺进仰光,缅战即告正式结束,中国驻印军也于5月至7月空运和陆运调回国内广西南宁一线。

小 结

这场战争凝聚了中、美、英作战部队和筑路部队以及印度、缅甸、西藏、云南等各族民工的血汗和生命。我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共投入兵力30万人,在作战过程伤亡约7.9万余人,筑路部队伤、病、死1000余人,收复了缅甸国土14万平方公里和滇西国土4万平方公里。新、改建和打通中印公路全长1736公里,新建成中印油管全长2960公里,打破了日寇对中国陆上国际交通线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封锁,粉碎了日寇妄图切断中国外援,迫使中国投降的狂妄企图。当时国内其他战场在日寇一号作战计划的凌厉攻势之下节节溃败,而滇缅战场是唯一打胜仗的战场,捷报频传,再加中印公路的通车,中印油管的通油,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日本侵略军在这场战争中,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缅甸作战》记载,共计投入兵力308501人,战死185149人,残留回国118352人,以惨败而告终。这场战争把日军胶着

在滇缅战场上,粉碎了他梦想西进印度和纳粹德国在南亚会师以囊括世界的狂妄战略图谋。

緬、滇之战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战争。当时美军正在太平洋展开艰巨的逐岛攻坚争夺战,日寇陷在中、緬战场总共兵力达130万之众,无法调去太平洋地区增援,使美军得以减轻压力和抗力,从而获得节节胜利。

緬滇之战瓦解了日军在缅甸的统治,为缅甸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减轻了

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鼓舞了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和斗志。

这次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派兵出国御敌战争的胜利,打出了中国的国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作者曾任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1985年离休前任《东北公路》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吴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18.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2005年)	人物年鉴社	198.00	1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5.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6.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6.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陋室漫笔	靳树鹏	21.8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1600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日军侵华的鸦片战略

● 兰殿君

鸦片战略 以毒制华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这一罪恶计划的实施，使日本获取了大量的侵华军费，成为毒害民众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又叫嚣“亡中国可不用枪炮”。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实为将中国殖民化的前奏曲。

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披露，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伪满傀儡政府的规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并逐渐向国统区渗透。又据日本学者掌握的材料，仅侵华日军贩毒机构——宏济善堂（1939年4月成立，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在华开馆5年即盈利逾10亿日元。若拿这笔巨利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沦陷区，日本倾销鸦片几近疯狂。关东军向满洲贩卖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今沈阳）为集散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又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

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军入侵之地，即是毒品交易泛滥之处。更为歹毒的是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政府纵毒 设置专卖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官办机构，进行鸦片的生、交易，以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售成品给瘾者。为垄断专卖，总署行文各地取缔私人经营，但禁而不绝。伪康德四年（1937年）6月末统计，政府在各地共设立鸦片零售所1890处，吸食毒品者1933年为56804人，到1937年增至为811005人（见1940年出版的《民生年鉴》103页）。伪国务院总务厅《政务概况》披露：1938年1月，由于“吸食骤增”，烟土亦告竭。当局于本年一次从伊朗输入鸦片1500箱，“以济瘾者之急需”。可见证伪满洲国的统治阶级荒唐无耻到何种程度。

政府设点专卖鸦片，造成了烟毒的泛滥成灾，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不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37年制订了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又成立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继之又在铁岭、绥化增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1800多个“烟管所”充实扩大，实行官营。《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只字未提对瘾者的治愈和限产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予鸦片”

的原则。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领到政府颁发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实则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以此创造税收。

遍植罂粟 民食维艰

据 1937 年伪满《民政年报》等官方资料披露:1933 年至 1937 年鸦片的栽种,已遍及伪满洲国的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 68 万 5 千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的面积。以热河省为例,1936 年罂粟种植增加二千顷,总收获量达 825 万两(见《日伪档案》第 262 号)。1941 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直接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根据

1943 年禁烟总局制定的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实行集团栽种。这一年三省被指令种罂粟六百公顷,四平省开原县“被指定的 320 顷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毒品。各地所收获的罂粟由鸦片专卖机构按定价每两一元二角统一收购。对于拥膏腴之地拒种罂粟的农户,政府强令种之,如间岛、安东(今丹东)地方农民愿种花生、玉米,当局则出动军警强行毁稼,“一时四野哭号”,怨声载道。由于大片良田广种罂粟,时时出现粮荒。国民偶然吃上一顿粳米、白面,则有成为“经济犯”的危险,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可谓悲乎哀哉。

敲骨榨髓 烟害为烈

鸦片实行专卖以后,当局见其既可毒害民众,又能攫取暴利,越发鼓励。伪康德五年(1938 年)哈尔滨市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有 70 处管烟所,有管理人员 150 名,服务人员 452 名。同时还有哈尔滨市成膏所,专司鸦片的加工发售工作。登记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有 29240 人,卖出成膏四亿零七百九十七万余两,渔利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余元。又据官方公布,1932 年政府鸦片岁收入一千



这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九辑临时增刊上的宣传单,宣传单上印着清晰的黑字“癮者同胞请看:买官土(日本人生产的大烟)吸食的这两位乐哈哈,实在是坦然自在……”宣传单左下角署名是“民政部、蒙政部、军政部、治安维持会、专卖总署”

九百四十万九千六百三十七元,1936 年增到三千七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四十一元(见 1937 年《政务概况报告书》上卷 139 页)。政府在获取巨大收入的基础上,纵毒计划亦逐年扩大。1939 年的财政预算中为发展毒品事业,所作的庞大预算为四百一十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六元,其中仅购置吸食鸦片的器具占经费 3%,余为收购鸦片原料及增设销售网点的费用。

这样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毒品产销事业,不能不使其治下的子民遭受灭顶之灾。当年许多人成瘾中毒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日本人又反唇相讥,说满洲人是一群“东亚病夫”。1938 年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被大大缩小了的。现存的敌伪档案材料表明,政府纵毒仅哈尔滨市的抽样调查,便可见烟毒为害之烈:哈尔滨市吸食鸦片者以中壮年为主,其中 30—50 岁占 76.56%,其次是 20—29 岁占 11.09%,51—69 岁占 8.7%,上瘾二年者即神志恍惚而丧失劳动能力。一批一批健壮的人,成为鸦片的牺牲品,这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 郑连根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事发之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以“中立”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上海租界成了“孤岛”。此时，英、美、法等国的租界也以“中立”态度应对时局变化。一方面，租界当局不想得罪日军，警告租界内的中国报刊不得使用过激字眼，不能以“敌”、“敌军”来称呼日军；另一方面，租界也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人创办的新闻事业予以切实的保护，不容许日军干预租界内的新闻事务。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力量在1938年初创办了一批打着洋人旗号的报纸，使租界的抗日报刊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名的报刊就是《每日译报》和《文汇报》。

《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当时的上海租界有许多外文报刊，在这些报刊上，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评论很翔实。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了《译报》。《译报》将外文报刊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翻译出来，向人们报道抗日战争的进展，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但是，《译报》因其抗日锋芒太露，很快引起了日军和租界当局的不满，仅出12期就被取缔了。《译报》被取缔后，中

国共产党又于1938年1月21日创办了《每日译报》。吸取《译报》的教训，《每日译报》名义上改由在香港注册的英国商人、中华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斯·裴（J.A.E.Sander）、拿门·鲍纳（N.E.Bonner）两人出面发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为了迷惑日军，《每日译报》的创刊号上还特意宣称：“一张好的新闻纸，应该使人发生好奇的心理——对于别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事，发生好奇的心理。一般的来说，这就是《每日译报》主要的宗旨。除了提供当天新闻中一种正确而且及时的精粹外，我们还应先译述各国报纸中的权威作品，尤注意有关中国和远东的事情。我们对于所提供的题材，毫无特殊的偏见，更无偏重的成见。我们尽量地大公无私地来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每日译报》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战的主张作为自己报道的主要内容，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文章以及党的重要文件都进行刊登。从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共连载了12天。1938年11月27日，它又以“转译”的形式刊发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告全国同胞书》。通过刊发这些重要的文件，《每日译报》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了上海租界，给身陷“孤岛”的人们带去了思想的曙光。

与此同时，抨击汉奸投降活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也是《每日译报》报道的重要内容。早在汪精卫公开叛国之前，《每日译报》就于1938年10月12日发表社论，批评汪精卫对外声称“中国未关闭调停之门”的做法，指出这种妥协言论的危害性在于松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好让日

本侵略者从容消化已得赃物，而后一举灭亡中国。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每日译报》组织了大量声讨稿件，发动了“讨汪攻势”。1938年6月15日，《每日译报》转载国联鸦片问题会上美国代表的发言，披露日本从伊朗收购46万磅鸦片运至中国沦陷区的罪恶行径。9月3日，又发表社论，呼吁制裁日军在华使用毒气的丑行。1939年3月10日，又转载美联社消息，曝光日军护送3700箱波斯鸦片至上海沪西区的事实。

《每日译报》还多次发起与组织抗战支前、捐献活动。1938年7月，在“孤岛”首创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三个月内收到捐款1.6万元。1939年1月，又组织新年献金捐款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募得大笔钱款和物资，组织了两批上海民众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

在《每日译报》创刊后第五天，即1938年1月25日，严宝礼等留居“孤岛”的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仍以英商报的面目出版，名义上由英国人克明（H.M.Cumine）担任董事长兼主笔，实际上主持报务的是严宝礼。胡惠生、徐铸成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文汇报》坚持民族大义、坚持抗日宣传，大力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创刊号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津浦线上包围了山东日军的消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文汇报》从1938年3月19日至4月10日的23天中有22天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军队的辉煌战绩。

除报道正面战场的战果外，《文汇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它创刊第三天就报道了八路军挺进平绥、平汉、正太铁路三角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绩；1938年3月15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西北大战的展望》，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现状予以高度评价：“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余之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已厉兵秣马，准备为保护国土，献身祖国。八路军主力，现集中陕晋边境者无虑二十万，经多年之奋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远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为一个作战单位。”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文汇报》的“文会”副刊就很有名，它于1938年2月8日刊登了题为

《朱德将军最注意的事件》的通讯。此外，它的“世纪风”副刊也很成功。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进步文艺界的支持下，左翼作家柯灵主编的这个副刊逐渐成为“孤岛”上一个强大的抗日文学堡垒，它每天刊出一至两篇杂文，并出过多期杂文专辑，内容都是以宣传抗日和反对汉奸为主的。此外，它还刊发报告文学、通讯和特写。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进行曲》、勃脱兰的长篇通讯《与中国游击队在前线》等就是在“世纪风”上发表的。

《每日译报》、《文汇报》的创刊，带来了“孤岛”抗日报刊发展的新局面。受两者启发，《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英商报纸纷纷创刊，一个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宣传阵营建立起来了。到了1938年9月，上海著名的商业性大报《新闻报》及其晚刊《新闻夜报》请回了原馆主美国商人福开森（J.C.Ferguson），改由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0月，《申报》也聘请美国人安德林（P.M.Anderson）为董事长、阿乐满（N.F.Allman）为总主笔，从汉口迁回上海，挂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招牌出版。11月，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中美日报》创刊，名义上由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施德高（H.M.Stuckgold）为董事长，实际上由吴任沧、骆美中等主持。11月21日，上海著名的《大晚报》也脱离日伪的新闻检查，改由英商佛利特（B.H.Fleet）主持的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939年4月底，在小小的上海租界，每日出版的“洋旗报”已经有15种之多，总销售量达20万份，形成了浩大的抗日宣传声势。

在“洋旗报”崛起的同时，各类抗日刊物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版，主要有《华美》周刊、《上海妇女》、《杂志》、《文摘》、《译报周刊》、《公论丛刊》、《文献》月刊、《良友》画报、《职业生活》、《导报增刊》等。其中，《华美》周刊创刊于1938年4月，因挂名美商的华美出版公司而得名，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时事政治性刊物，王任叔、梅益等主持编务，被称为当时上海“最精彩、最富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文献》月刊创刊于1938年10月10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份时事政治性刊物，以发表抗战文献为主，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发行，钱杏

任主编;《职业生活》创刊于1939年4月15日,初以英商《国际日报》增刊的名义出版,后因《国际日报》发行人被汪伪政权收买而改为独立出版。

从1939年5月以后,租界局势日益险恶,“洋旗报”受到挫折。5月18日,《每日译报》、《文汇报》被停刊;6月1日,《华美晨报》被停刊;7月1日,《导报》被停刊……到了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洋旗报”几乎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抗日宣传的重心转向刊物。于是,1939年下半年,我党又创办了《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时代》周刊等,使得抗日刊物的队伍更加壮大了。

这一时期,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力量也创办了不少抗日刊物,比较有名的是《中美周刊》和《大美周刊》。《中美周刊》创办于1939年9月23日,是国民党在《中美日报》第二次遭停刊处分后,为了继续宣传抗日而创办的,它挂靠在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的名下。为了明确表示自己的抗日主张,它在发刊词中称“将一如本公司所出版的《中美日报》”;《大美周刊》创刊于1939年6月,挂靠在美商大美出版公司名下。

“孤岛”上的抗日报刊经常受到日军和汪伪汉奸特务的破坏。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找到了一个流氓常玉清,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叫“黄道会”的恐怖团体,专门破坏抗日宣传事业。比如,1938年初,汪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要求租界报纸刊登该局的一个通告,《华美晚报》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结果当晚就有一个暴徒来报馆投掷一枚“锤形手榴弹”,炸伤三人。次日,报馆又收到了这伙暴徒的恐吓信,扬言要炸毁报馆;同年2月10日,一个暴徒闯入《文汇报》报馆,投掷了一枚“木柄手榴弹”,炸伤三人,其中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去世。据统计,自1938年1月至5月,“黄道会”就向抗日报馆投掷炸弹八次,受害报馆除了上面提到的《华美晚报》和《文汇报》,还有《每日译报》、《导报》、《大美晚报》等。此外,他们还采用投送人手、悬挂首级等更为残忍的手段恐吓抗日新闻工作者,《华美晚报》、《文汇报》的负责人就先后收到他们投送的人手和字条,字条称:“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

味。”

1939年春,汪伪政权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以丁默、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机构,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6月16日,这个机构向所有坚持抗战宣传的“洋旗报”的工作人员投寄了恐吓信,警告收信人不许“反汪”、“反和平”,否则“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对于日伪的恐怖活动,“孤岛”上的抗日爱国人士临危不惧,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收到汪伪特务的恐吓信后,《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表了“公开回答信”,痛斥伪特务的卑鄙手段,表达了宁死不屈的爱国热情。他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文章发表后,迅即为人传诵,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当然,朱惺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第一个被汪伪特务暗杀。随后,《大美晚报》的负责人张似旭、大光通讯社的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主持人朱作同等也因坚持宣传“反汪”、“抗日”而被汪伪特务暗杀。

为了对付汪伪汉奸特务的暗杀,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各报馆纷纷加强了“戒备”:装上铁门、布上铁丝网、雇人巡逻;不仅巡逻的人数较平日增加许多,而且由徒手执勤改为武装站岗。可以说,这时的报馆几乎与兵营无异。许多坚持抗日宣传的报人干脆将铺盖搬到了报馆,吃住全在报馆,尽量不外出,以防遭遇不测。与此同时,抗日新闻工作者还与租界当局沟通,寻求保护。租界遂派出巡捕在报馆林立的福州路一带昼夜巡逻,对于被日伪视为眼中钉的《大美晚报》,租界当局常年派一辆铁甲警车停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并在附近设了两座堡垒,派兵驻守。就这样,经过抗日新闻工作者的英勇反击和租界当局的配合、保护,“孤岛”上的抗日宣传活动虽然险象丛生,但始终没有被日伪特务剿灭,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租界。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英已对日宣战。(责任编辑 吴思)

秦家店的郡县制

● 尹振环

谈“秦家店”不能不谈“郡县制”。而谈这个问题,又不得不从《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谈起。

一 《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

1974年5月毛泽东有首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固然这里已在“批孔”,但重点在“从柳退”。所谓“退”,显然指从郡县制退向分封制。同年8月5日又传来了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书坑儒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流传之诗,究竟是“少骂”还是“莫骂”;“多行”还是“都行”;“祖龙虽死魂犹在”,还是“祖龙魂死业犹在”;多方比较,看来上述文字比较可靠吧?

过了两个月即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岸苗的文章。它是这样说明和肯定郡县制的: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尹注: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结构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这篇文章是揣摩之作,还是承旨写作,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显然是同意作者把“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郡县制”基本划等

号的,后面又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郡县制等于国家统一,维护今天的郡县制等于维护统一,等于“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今天行郡县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是否如此,我们不得不追溯郡县制的由来及其利弊。

二 郡县制的由来与实质

《辞海》释“郡县制”为:“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这里仅仅视郡县制为一种地方政体。但毛泽东视为“秦政制”,而《人民日报》的文章与《封建论》是把郡县制看成国家政体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吕思勉先生20年代的《中国国体制度小史》,把郡县制看作“国体”：“由部落而至封建,由封建而至郡县”,即三种“国体”的递进程序。他又把郡县制看成一种时代:“我以为国家之成,实经三时代:(1)部落时代,(2)封建时代,(3)郡县制时代”。这种对时代、对政体的概括划分极为简炼而深刻,能发人深思。

郡县制是由分封制(柳宗元和吕先生谓之封建制)演变而来的。周灭商后,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阔疆土,大封诸侯:第一,封“功臣谋士”,如开国大功臣姜太公吕尚被“首封于齐”。第二,封兄弟、同姓五十余人,只要不是疯痴,都被封为诸侯。第三,对助周伐纣的“八百诸侯”,承认其

地位和占有的国土。第四,臣服的商纣遗老遗少,如纣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见《史记·周本纪·殷本纪》)。受封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之子,天下之共主。诸侯在分得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设百官有司,组成宗族的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为卿大夫。因此,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皆“支子母弟甥舅也”。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就成了所封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各方面的自主权。这就是宗法分封制,是我国早期“封国土、建诸侯”的权力分配、政治结构形式。它适应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上缺乏联系的现实。随着一再传后,始初亲密的血缘关系变得如同路人,同时出现了强弱治乱的不同,于是“列侯骄淫,赍货事戎”,大吞小,强食弱,战乱频仍,周天子则由“威分于陪臣之邦”,到“国殄于后封之秦”,西周时的千余诸侯,变为百四十余,再变为十几,后由七雄统一于秦。

春秋战国时,许多侯国拓地千里,他们如何处理国土、分配权益呢?依然搞分封,允许被封国拥有地盘、都城、武装和宗子世袭吗?数百年大权旁落终遭弑逆篡夺的教训,都告诫君王那样办后患无穷,并且它不利于应付当时残酷的战争。于是由国君直接任免长官的县、郡,首先在灭国、在边疆建立起来,后来又扩展到内地。同时宗族式的中央国家机器,也由于难以适应兼并战争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被非贵族出身的、甚至出身贱微的、可以随时任免的客卿和官僚所取代。但是,春秋时,县常常被化为私产,战国中后期,也仍有一部分国土属于私封地。全面彻底推行郡县制的是秦始皇。灭六国后,他断然拒绝“请立诸子”的建议,一方面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赏之”,尽管封了个别功臣为侯,但不得拥军、不割地、不治民;另一方面,“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监、尉”,政、军、监互不统属,互相监督。中央同然:三公九卿,只对皇帝负责。诸子侄“为匹夫”(《史记·秦始皇本纪》)。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器,现在为大批官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郡县制、官僚制的政治结构建成了。

可见始初的、广义的郡县制就是一种国家政体。它的全部含义是:(1)一种处理帝王与宗室、功臣、重臣权力分配的方案。中央及地方大臣、重

臣,不得拥有自己的军队、地盘,以成势位。(2)它含有君王掌控大臣、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六柄”的含义。柳宗元的话叫“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其实何止于“斥”。为秦浴血奋战近四十年,战功显赫一代的名将白起,秦昭王就能轻易赐死。一旦秦二世靠阴谋篡夺帝位,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继而“行诛大臣及诸公子”(《秦始皇本纪》)。(3)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令中央,服从帝王。“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总之,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所以“郡县制时代”,用历史教科书的语言来说,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时代的代称。这种政治体制:第一,保证了书同文、行同伦,使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第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它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它是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重要政治保证。秦以后有四次违反郡县制的分封,无不招来内乱。所以,人们才肯定它比分封制进步。但也不容否认,它从一开始就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一,它不仅使“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而且使全国官吏,无一例外地匍匐于帝王脚下,使之所思所言所趋都是一种模式:“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倾天下为一家”。它成为帝王滥用权力的工具与保证。使帝王在某些时候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它无法走出一治一乱、恶性循环的圈子,也无法避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在郡县制下,“国之治乱,在君一人”,而一个朝代世袭之君,十之七八皆为昏、庸、懦、暴、幼之君,很少明君、圣君,加上奸佞之臣,总是将社会推向灾难,天下徒叹奈何。秦王朝与隋王朝就是极好的证明。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说成是“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只能说明政治制度出了大问题。但愿不是说,文革时期我们已由“民国”、“人民共和国”时代退到“郡县制时代”。

三 孙中山、马克思主义之于郡县制

照吕先生“原始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的划分,那么辛亥革命后,就可以说是进入“民国时代”了吧?我们先看看孙中山先生的设计,他设想了什么样的方案以取代郡县制。

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过是被瓜分的物件,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可言,交粮、纳税、服役才是他们的“权利”。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除了依靠大自然的恩赐之外,往往要看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旱涝之后多少还可想点办法,骂几句娘也不关紧要,而碰上一个无所不能的帝王及其触角遍地的统治机构,则只能徒叹奈何,除非逼上梁山。随着生产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莫奈何的无权状态,终于提上日程。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上就是权力分配的扩大,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名义将帝王垄断的权力收回,谓之“还政于民”,由“人民”产生和制约权力机构(加之居住、迁徙、言论、思想、出版自由),以改变“无可奈何”的局面。孙中山先生主张以县为自治单位,“移官治为民治”,只有自治、选举,“主权在民的规定,方不具空文”。由于省的地盘大,割据势力大,所以孙先生主张一方面省受自治之监督,另方面受中央之指挥:省长自选、省宪自立,但一律不得违国宪。孙中山先生将政府喻为一部“车”,过去车属皇帝所有,他愿开则开,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自然享受者只是少数人。今天“车”属人民了,而总统、官员,不过是人民雇来开车的“车夫”,人民怎样制控车与雇车夫呢?那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政权”,来指挥上面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大“治权”,合而谓之“政治”。但当时人民的大多数一时还难以享有这些权力,他们不过挂名,因为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生存尚感困难,还管得了许多。真正享有者不过是有钱有势、拥有财富、掌握知识的少数有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前冠以“资产阶级”的缘故。当然孙先生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经过军政、训政、以达宪政的过程。后来孙先生又发现,不“掘陈土”——即不彻底从体制、从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铲除封建专制主义,连这也难以实现(上引均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23、529、759页)。

以上就是孙中山之于郡县制主张的大概。下

面看马列之于郡县制。

由于把郡县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不得不引经据典了。

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变革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为“还政于民”提供经济基础。先“还政”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然后还政于社会。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所说的“人民”变为实在,它为每个公民都能享有政治权力提供可能。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和其他经济目的的一个过渡性的、迫不得已的手段罢了。所以完全可以想象马、恩、列之于“郡县制”的主张是什么了。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大量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断。这些论断可以同时代表马、恩、列的主张。

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总之,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Gemeinde)都有美国式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度,这已经由美国 and 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三卷,226、22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

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子厚”的味道?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最高成就”。恩格斯在其导言中说: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

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000 法郎（名义上约等于 2400 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 6000 卢布）。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理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

可见马、恩、列力主：第一，“自治”，甚至是“美国式的充分自治，这正是我们应该有的”。他们了解美国也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并不排斥自治。第二，普选。马克思的话叫：“用等级任命制去代替普选，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第三，必须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要“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恩格斯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哪有一丝一毫郡县制的味道？1891 年恩格斯再一次告诫：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应该“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帝王设计的，马、恩、列则是为人民大众为无产阶级设计的。它毫无“尽畜于我”（柳语）之意，而是对“摄制四海”的人的“摄制”，四年或七八年之内必须让贤，更绝对不能让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对于一切所谓的“人民公仆”，“朝选而不道，夕罢免矣；夕任之而不法，朝撤之矣。”哪里与秦皇、柳宗元有半点相通？

四 法式的“郡县制”

现在我们需要拿西方的“郡县制”作一个比较。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终于为连连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的拿破仑所摘取。他在 1799 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不久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愿做的一切。”果如所愿：他修改宪法、执掌全部政权，使四院（参政、立法、元老、保民）成为“哑配角”，再无权解决任何国家大事，后来干脆连立法、元老、保民三院也不要了，并取消所有民选官

员，中央及各省高级官员统统由他任命。1802 年他宣布自己成为终身执政，1804 年登上皇帝宝座。他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让教皇为其称帝加冕，赢得君权神授的光环，将“神职宪兵”——僧侣争取过来。进而继续查封报刊、控制舆论，恢复严刑峻法，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公民的一切权利被无形地取消了，一律变成顺从他的臣民。这岂不是法式的“郡县制”？拿破仑就是借助这个制度，征发 300 万军队（十四世纪前，国王征集三万军队也困难），东征西讨，“把整个欧洲踩在脚下”，一度使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没有法式郡县制，拿破仑可以以为所欲为吗？

如果华盛顿不是面临美国十三个州自治的传统，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郡县制，他能否拒绝君主政体，不成为美利坚王国国王呢？如果拿破仑成了华盛顿，到了美国，他能否黄袍加身呢？哪怕朝思暮想，念念不忘。

如果中国、苏联已经彻底废除了“郡县制”，能否兴起现代迷信、现代造神运动呢？

凡此是需要比较研究的。

总之，郡县制与马克思主义相距万里，冰火难容。时代不同，性质、作用、目的完全不同，岂能划等号。至于秦始皇，能否与马克思相加，相加的后果是什么，文革就是最好的答案，无须多言了。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敬告读者

2004 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3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2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1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1999 年精装 75 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 袁伟时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顶子。凡专制政权必豢养此类爪牙。在历次文字狱、冤案和戊戌政变等大小事件中均留下了此辈身影。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儒门盛衰都应“反求诸己”。困厄是沿着传统旧径滑行的恶果。

第一，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

这个时期的儒学主流一直有条非常坚固的思想长城：中国文化（主干是儒学）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无庸外求。“天朝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与侵略者五次大战，无不失败，就是中国人为此天朝心态付出的代价。时至20世纪，虽有改变，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举世无双的观念，仍不时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壁垒。1949年以后，那么多人迅速形成“革命的”天朝心态，在极其落后而封闭状态中沾沾自喜，亦是传统思维的余绪。

第二，政教合一。

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学成了历代王朝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连绵二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它在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中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同一切依仗政权强制推行的人文思想一样，它有两个如影随身的副产品：

一是培养出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与政权结合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不恰当地把宗教性的道德标定为社会日常的行为规范，而且使之成为博取荣誉地位的首要条件。职是之故，矫情欺世之辈，比比皆是。

二是假“卫道”以营私之辈不绝如缕。其上焉者不惜借权力打断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生机，突显自身的“忠诚”。下焉者则冀图以人血染红自己的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

“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

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

第三，传承了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浩然正气。

外来侵略与内在专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最大忧患。在这些邪恶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没有中绝，这与儒家思想和道德传统的熏陶密不可分。

在侵略者面前，中国军人大都坚持了民族大义。例如，吴佩孚便冷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拒当卖

国贼。这是他服膺儒学,修身养性的结晶。“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其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这副自撰联道出了这位儒将的情怀。

儒学还造就了不少在专制淫威下不屈不挠的耿介之士。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大儒——梁漱溟、徐复观就是其中佼佼者。

第四,薪火相传,开创了现代儒学的新格局。

儒学没有在中国消逝。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已经形成了适应新时代的生存形态。消逝的仅是那些应该消逝的成分。

儒学新的存在是由各有特色的部分构成的。各部分互相渗透,为方便说明,可以强分为三:

一是思想儒学。由康有为开其端。20世纪初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国粹派别树一帜。民国建立后东方文化派继起。20年代《学衡》派与梁漱溟等奋起与西化派抗衡。30年代后,以熊十力、冯友兰先后推出自己的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为标志,新型的儒学已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继近几十年新儒家在港台和海外名家辈出后,近年在大陆也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创立自己的儒学理论的新一代学者。

二是学术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出版的儒家典籍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盛的年代,而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是研究。19世纪总结汉学成果,成绩斐然。20世纪,儒学研究已纳入现代学术轨道。除一切学术活动均不正常的50—70年代外,观点的歧异,体现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繁荣,也表明非学术的压制已经力不从心。

三是大众儒学。在汉族民众中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中断。风俗习惯的传承,古籍的阅读和传统文学艺术的感染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基本渠道。从市井小民到赳赳武夫,完全不沾儒门雨露的极为罕见。

那么,人们为何老是慨叹人心不古,儒学飘零呢?

有的是对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不适应。从钳制和统一思想的标准转变为多元中的一元,角色的转换导致相应的心态转换。恋旧者不胜沧桑,无限悲凉。

有的则是道德秩序重建中的感慨。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中与现当代性不兼容的部分必然反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变动不居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一再出现冲破原有道德规范的状况。要是前者比较容易赢得人们同情的理解的话,后者则屡成怨府。

对新世纪的展望

鉴往知来。未来的儒学也许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回归“原儒”。

原儒就是学在民间,不是也不应是某一政权的意识形态。

原儒是学,是商,任侠,参政……广布人间,无所不适。

原儒的唯一依靠是学术自信,以理服人,赢取众信。

第二,告别“醇儒”。

“醇儒”的世界是一元化的。现代文化是多元的。过去没有未来更不可能有儒学的一统天地。

“醇儒”的文化心态通常是排他的。同一切学术流派一样,儒门有许多欠缺。多元的现代文化有公认的共同价值基础,例如:自由,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排拒这些来自异域的价值观念,必然又一次祸国殃民。

“醇儒”的修身往往流于虚伪。人性复杂,“不为圣贤,就为禽兽”的说教是荒唐的。学的基础是理性,不是盲信。现代人应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广收博取,儒者亦不例外。同时,儒门雨露广被四方,释、道、耶信徒中不乏儒门智慧的现象必将更为常见。

总之,封闭性的“醇”不足为训。博乃至杂才是儒学未来的存在。

第三,多出大儒。

在多元世界中儒学能否在海内外吸引愈来愈多的追随者?没有新的思想家就没有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震撼力。思想学术无国界。这些思想家应有能力在世界学术论坛中角力。

关注儒学未来,首要的任务应为新时代的孔孟荀的不断涌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政商勾结：韩国的毒瘤

● 詹小洪

一 腐败令历届总统难于善终

1987年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是年总统大选，第一次和平地实行了政权更替。迄今已历四届总统。每一任总统上台无不信誓旦旦，向国民承诺铲除腐败，但结果历届总统无一善终，不得不就各种丑闻低着头向国民谢罪道歉。军人出身的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如此，政治人物当选的总统也如此：以上任伊始便号召政界开展反腐败的“净手运动”深得民心的金泳三总统最后因儿子腐败丢尽颜面；民主运动时期的斗士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推行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和沉着应付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重振赢得了国民的高度支持，但他共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改革、道德性、国民参与政府”口号为标榜，被称作“平民总统”的卢武铉上任刚满一年，就遭到国会弹劾，停止行使总统职权。卢一条主要罪状也是其多名亲信收受黑钱搞腐败，总统选举时收受了企业非法资金，从而引发了韩国政坛地震。韩国最有影响的《朝鲜日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政商勾结题为《根深蒂固》的漫画，旁边的文字写道：“每当选举结束，总会暴露出来一些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虽然检察机关全力以赴杜绝官商勾结，但由于根深蒂固，很难连根铲除。”

国际透明性组织（TI）每年均对一些国家进行“腐败指数调查”，以10分为满分，得分越高排名靠前证明该国越廉洁，反之则相反。2002年调查了21个国家，韩国排18位，被列为最腐败国家之一。近几年韩国国内十件大事中，2000年

“金融腐败”列第七件，2001年“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也榜上有名。韩国政界的腐败引起了国民的极大不满，一个民间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韩国青少年90%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但更要命的是，他们中有很大部分居然有意在“什么时候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韩国一个经济学教授撰文说：“如果韩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日本的程度，那么经济增长率将会提高1.4—1.5个百分点。”

二 非法资金勾结政企

韩国政界选举很多：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市和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地方首长选举、地方议员选举等等。选举就要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高昂并逐年升高。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企业为政界选举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是最典型影响最大也最为国民所痛恨的腐败。虽然有《政治资金法》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的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费用，公营的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目的也是防止他们向企业伸手要钱。但是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人的需要。举个例子，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约1200韩元比1美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根据《政治资金法》，企业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

录在案。企业提供的经费超过了限额就属非法政治献金。这种非法献金有时往来账目极为模糊,甚至是送现金。第十六届总统选举时,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的幕僚崔某收受 SK 财团 100 亿韩元非法资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2 年总统大选动员时,大国家党的选情看好,极有可能上台,该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就向 SK 财团提出了赞助要求,SK 财团就派人将 100 亿韩元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崔的私人停车场。

企业向政客们提供的政治资金名目很多。选举过程中的“总统选举资金”相当于企业的“投保”,企业一般都给自己看好或关系密切的党派的候选人钱,但选情变幻莫测,有的企业怕押错了宝,就竞选双方都给钱求个保险。如果万一押错了宝,自己没给钱的那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了,企业往往就会送上“祝贺当选金”,请求当选者今后给予照顾,也算是对选举过程中押错了宝的“亡羊补牢”。韩国所以不断发生企业向政界行贿的理由,在于企业从未放弃过利用政治献金轻易获利的想法。因为收受了企业献金的党派的候选人上台后肯定会“投桃报李”,一般是通过政府隶属机构或金融机构给予企业优惠贷款和减免税务方式报答。2000 年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支援给执政的民主党的资金为 200 亿(仅检方查出的部分),和同年南北方首脑会谈之际替政府向北朝鲜秘密汇款五亿美元。以此为代价,现代集团从政府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高达 33 万亿韩元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援即优惠的贷款。这一切均是由于东窗事发后,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的自杀,由于检方的介入才真相大白的。固然企业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有时是不得已,为此,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但是,媒体批评企业界无论是为了“投保”还是为了“追求利益”而提供了资金,其目的和手段都算不得光彩。韩国政企在腐败问题上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是很难说清的,公众也很难判断政界和企业谁更腐败。

应该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时收受的企业献金一般都还是作

为政党经费使用,毕竟绝大多数资金还没进入个人腰包,属于集体腐败。但攀附权贵、以权谋财、拉拢选民等形形色色的谋一己之私的腐败在韩国也不少见,以后当另撰文阐述。

三 政企勾结腐败之探源

历届韩国政府为了打击腐败,也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国会还注意通过立法从制度上反腐败。前几年就有了专门的反腐败法。该法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可获得最高达 2 亿韩元的奖励和彻底的安全保障。对举报腐败的奖励上限超过了举报敌谍(1.5 亿)和逃税犯(1 亿)。针对议员选举时政客拉拢选民的贿选,检察机关规定,如果选民接受了 30 万韩元(合 2100 元人民币)以上的财物,就会被拘留。因为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而遭厄运、逃亡国外、下狱、乃至自杀的大企业的董事长、总裁为数不算少。但是政商勾结的腐败仍屡禁不止,成了韩国社会的一颗毒瘤。归纳韩国内媒体的看法,似有下列原因。

首先,韩国一直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民主化以前的年代,大至制订国家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海外投资、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内有研究韩国问题的学者说,韩国的大企业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政府,业主只是扮演了管理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政治情结很浓,摆脱不了依附权贵最后自己成了权贵的命运。十几年来民主化并没使情况有根本的改观,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家向政界靠拢,“商而优则仕”的现象仍不少见。翻阅近几届韩国政府内阁名单,不难发现不少部长出自三星、现代、LG、SK 这样大企业的管理层。

其次,韩国社会任人唯亲风气重。韩国也是个重视人情的社会,“血缘、地缘、学缘、人缘”在韩国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很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届新政府上台,就会对内阁部长、国营企事业单位管理层甚至连一些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大换血。当选人要对竞选时帮助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幕僚论功行赏。趋炎附势之辈则瞅准机会进行投机,每当新的权势实力人物上台(下转 77 页)

清代北京寺庙及其价值

● 吴兆波

北京现存的寺庙居全国其它城市之首,汇集了从晋代起历朝历代所建的寺庙,宛如一座巨大的古寺博物馆,蜚声中外。近代北京到底有多少寺庙,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不同,中外学者的考订依据也不同,仍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宇大部分都是清代和清代以前所建,尽管这些寺庙始建年代不同,它们能够保存至今,清代的重建和维修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 修建概况

清代乾隆中期对北京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整修,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命清宫内务府普查了北京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城区及城外十五里内附近要路的庙宇观堂等近 2000 座,由清宫内廷拨款,内务府总理庙工处负责维修了百余座破损严重及年代久远的寺院,一些颓败的小庙宇被下令拆除,小修小补的工程责令寺庙自行维修。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经内务府查证西北城 770 座庙宇中 664 座完好,42 座需要修缮,剩下的 64 座中凡靠近大路有碍观瞻的

残破小庙观等需拆除。经乾隆中期对寺庙堂观等的维修和整顿,虽然总数减少,但使著名的古寺得到很好的保护。

《乾隆京城全图》所绘 1400 余条胡同中标注有 1300 余座寺庙,几乎每条胡同都有一座庙,但《乾隆京城全图》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而乾隆帝大规模整顿修缮寺庙是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开始的。从乾隆朝中后期开始京城寺宇总数在不断减少,至清末光绪帝下令将部分庙观改建学校,北京寺庙总数降至低谷。

从现有资料统计,清末较具规模以上的释、道、天主教等寺观堂庙院约为 551 座,其中唐代及唐以前修建的寺观等 29 座(道庙 5 座、佛寺 24 座),辽代修建的寺观 14 座(道庙 2 座、佛寺 10 座、天主及清真寺等 2 座),金代修建的寺观 14 座(道庙 2 座、佛寺 12 座),元代修建的寺庙 36 座(道庙 5 座、佛寺 27 座、天主及清真寺等 4 座),明代修建的寺庙 327 座(道庙 96 座、佛寺 223 座、天主及清真寺 8 座),清代修建的寺庙 131 座(道庙 50 座、佛寺 62 座、天主及清真寺等 19 座)。

551 座庙宇观堂中,佛教寺院 358 座,占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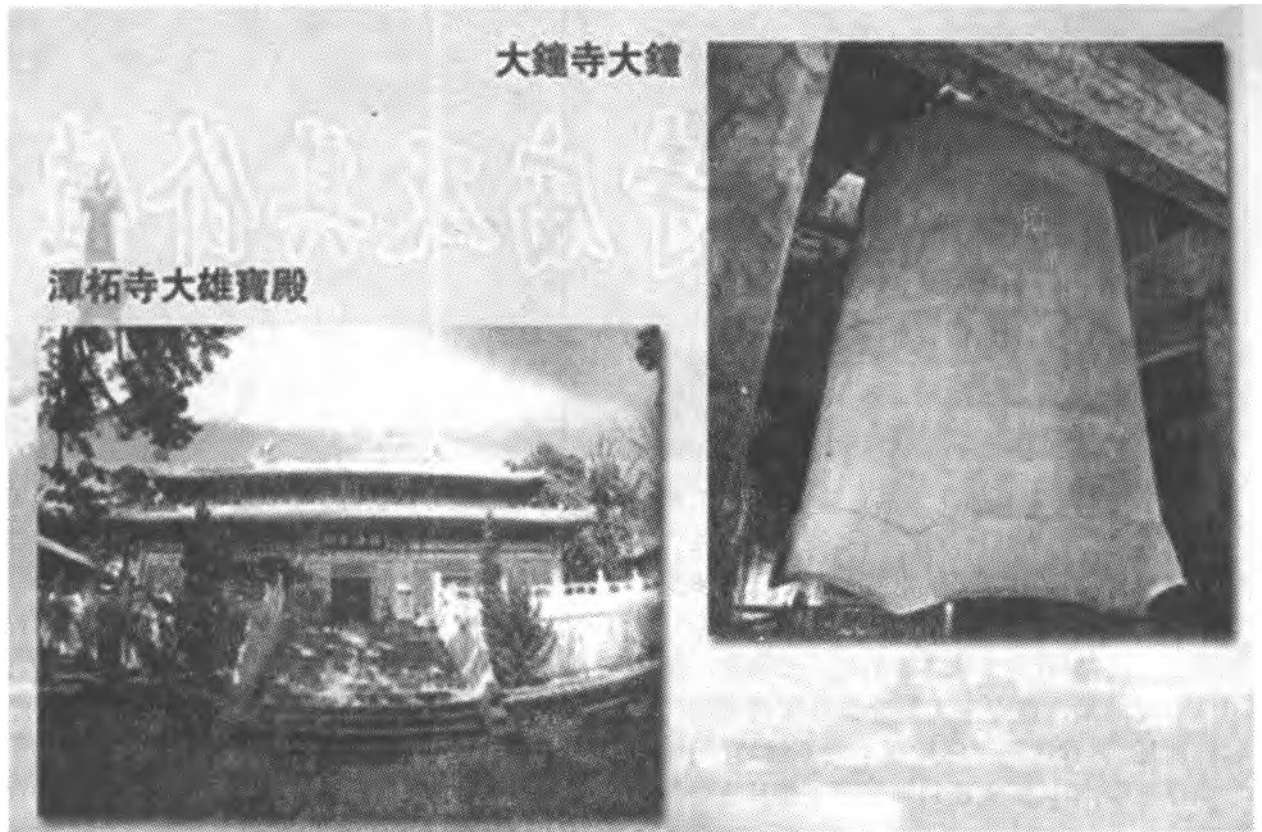
(上接 76 页)之前或之初,就会有人备着厚礼上门探访,媒体称这些“机会主义者”为“追赶新太阳的人”。韩国公众抨击“追赶太阳”的风气成为历届政府政策失败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第三,有贪渎文化的土壤。不管哪个政府部门都有贪污的公务员,连司法警察监察部门也不例外。2003 年中,韩国反腐败委员会进行的一个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公务员腐败”,其

中最腐败的部门依次是:建筑 75%、税务 61%、法律事务 57%、警察 55%、国防及兵役 48%。在 2002 年反腐败委员会发表的“2001 年 71 个公共机构清廉度”报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在第 71 名的竟是中央检察厅。

(作者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数的 65% ;道教庙观 160 座 ,占总数的 29% ;天主教堂及清真寺等 33 座 ,占总数的 6%。从明代起北京修建佛教寺院的比重明显下降 ,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民间神灵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清代天主教堂和清真寺的数量迅速增加 ,反映出社会对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需求。以上仅是从寺庙的名称上判断得出的统计数字。

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统的子孙娘娘 ,京城最著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明代时由道士主持 ,香火不旺。康熙年间改由僧侣主持 ,香火逐渐兴盛。清代到底有多少碧霞元君庙属佛教系统很难统计。清代兴建的寺院数量不是很多 ,但前朝历代沿袭下来的寺观数量却相当可观 ,清代用于重建和修缮历代留下古寺的负担繁重 ,开销巨大。如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年) 二年内务府总理庙工处奏报 :“ 修理元宁寺等四十一处 ,拆毁观音庙十四处 ,共需物料工价银十四万八千五百余两 ”。经过清代多次修缮的名刹古寺香火不断 ,继续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成为今天北京古都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千年古代文明的各式寺庙 ,体现出北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必将提高北京历史文化的含金量。

二 历史价值

据文献记载 ,周灭商以后 ,召公被分封到燕地 ,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燕国 ,燕国的都城名为蓟 ,蓟城的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外的西北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划全国为三十六郡 ,蓟是广阳郡的行政中心。以后历经汉、魏、晋、十六国、隋、唐等王朝 ,尽管数易其城名如涿州、幽州等 ,历经纷繁复杂的变化 ,它的城市基址从战国到辽代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大的变动 ,但是它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 ,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 ,是联络中原汉族与东北游牧部族经济文化交往的枢纽。

辽代以前 ,北京地区的名胜主要是一些规模宏大或历史悠久的庙宇 ,这些名寺古刹经过清代的修扩建 ,已成为京城各区县的名胜和标志性建筑。位于太行山余脉门头沟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建于晋代 (265—420 年) ,是北京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寺庙 ,所以北京流传着“ 先有潭柘 ,后有幽州 ”的民谚。潭柘寺历代都有重修和扩建 ,清代修缮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 清廷曾对潭柘寺进行大规模扩建 ,成为北京

地区最大的庙宇,香火鼎盛时期“有名和尚三百,无名和尚无数”,清代帝后常来此进香施舍,是当时著名的皇家敕建寺院。潭柘寺依山而建,规模宏伟,占地6.8公顷,分东中西三路建筑,蔚然壮观,现存建筑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

火德真君庙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修,俗称火神庙。火神庙地处后门桥,是元大都设计的起点,北京闹市区的最早形成地。据考证“先有火神庙,后有北京城”,火神庙坐北朝南的主体建筑和东向的大门,是北京城市中心由莲花池向东北方向转移的历史见证。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下令建造的悯忠寺(今为法渊寺),距今已有1300余年。唐以后历代都在其原址上加以维修,清康熙时增建藏经阁,雍正十一年(1723年)对全寺重加整修,并改名为法渊寺,其寺址至今未曾变动,成为历代北京城址变迁的标志性建筑。法渊寺内保存下来的碑刻铭文,真实地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幽州城址古迹等相关资料。

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之东北郊建立新国都,称为大都,使北京由隋唐时期的北方军事重镇、辽代的陪都、金朝的中都,终于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位于阜成门内大街的大圣万安寺(今为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是元代以来北京城内重要的喇嘛寺院,寺内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最大的藏式佛塔,也是元大都保留下来的显著标志。元代以喇嘛教为国教,元世祖亲自选定在辽代白塔旧基上重建新塔,元至元八年(1271年)动工,耗时八年才告竣工。全寺依塔而建,规模恢宏,修饰豪华,元皇室经常在此举行佛事活动。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

二十一年(1816年)、宣统元年(1909年)多次对寺和塔进行修葺,现在妙应寺基本上保持着清代修缮后的格局。

三 艺术价值

寺庙观堂的建筑、雕塑的造型、装璜、乃至彩塑、壁画、经书、供器等等都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文物和古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北魏延兴年间(471—476年)拓跋宏创建的光林寺(今为天宁寺)位于西城广安门外,隋文帝时(581—604年)在寺后建古塔藏舍利,即今辽塔的前身,是当时幽州城内北部最高建筑,也是北京地区一千多年来的人工最高建筑。隋塔不知毁于何时,辽代在寺后又建了一座舍利塔,即今之天宁寺塔,辽塔虽经多次修缮,至清代乾隆初年也已残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政府两次投入巨资重修。天宁寺塔十三层,总高57.8米,为砖筑实心密檐八角塔,是典型的辽代建筑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密檐式砖塔,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建筑学界甚至雕塑艺术界的重视。

京城寺廟分布圖



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年)的房山云居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藏经最多的石经宝库,历经千余年的凿刻,刻经百余部,经板万余块。清朝多次对云居寺进行修缮,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当年测绘的舆图及修缮云居寺经过情况的奏折。云居寺石经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奇迹,对研究我国古代佛学、雕刻书法艺术、古代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碧云寺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位于海淀香山东麓,寺依山而建,环境优美,别具一格。原称碧云庵,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扩建为寺。碧云寺有很多精美动人的雕塑,寺内近5米高的泥质彩塑哼哈二将、铜质大肚弥勒佛等皆为明代艺术珍品。清代乾隆年间重修了该寺,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按西僧贡奉的图样新建了寺后的金刚宝座塔,塔身布满浮雕,用工精细,雕刻生动,代表了乾隆时期高超的建造技术和雕刻艺术水平,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建于此塔内。在寺的左右分别修建了行宫院和罗汉堂,成为现在人们到碧云寺首选游览之处。

以壁画闻名的法海寺坐落在石景山模式口翠微山南麓,大雄宝殿内精美动人的壁画风貌各异,画师以传神之笔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加上光影色彩的“叠晕烘染”,以及沥粉贴金等技法和朱砂、石青、石黄等熏色,更增加了壁画的艺术魅力。壁画由宛福清等八位皇家画师而作,无论是用料、设计、绘画技巧都是当时最高水平,是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最好的壁画之一,在我国壁画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雍和宫是清代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原是雍正帝为皇子时的“潜龙府邸”。雍正继位后,将王府一半改作黄教上院,一半改作行宫,后行宫被焚,就将剩余的一半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将雍和宫定为喇嘛教寺院,成为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以其雄伟的建筑,精美的佛像,丰富的收藏享誉中外。雍和宫万福阁内高达二十六米的弥勒巨佛,是采选一株完整的白檀古树雕制而成,雕工精细传神,是雍和宫的三绝之一。闻名于世的四方碑亭造型独特壮观,亭内石碑四面分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镌刻乾隆帝御制《喇嘛说》,碑文是研究清代宗教和民族政策的重要史料,其阐述的金奔巴(瓶)掣签活佛转世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古寺名刹鲜明的时代特征、奇绝的建筑、精美的文物、独特的景观以及像智化寺音乐等都极具艺术和科学价值。

四 社会价值

北京寺院形成的庙会文化大大丰富了老百姓的娱乐活动,老北京人没有出过城的大有人在,没有逛过庙会的却很少,每逢年节逛庙会是大众最普遍的选择和出游场所。位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始建于元延佑年间(1314—1320年),清代经顺治、康熙、乾隆、道光朝的四次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使得东岳庙气势恢宏,布局整齐,规制严谨,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大道观。每年东岳庙会不光是京城百姓,连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香客都会赶来参加,庙会形成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集市,对商品流通起过积极作用。庙会还有各类名目繁多的花会表演,深受劳动人民的喜爱,也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白云观位于西城滨河路,是明代以来道教全真派的第一大丛林。始建唐代开元十年(722年),初名天长观,明正统年间改名白云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行了大范围的改扩建,现在白云观的整体布局和主要殿阁规制基本上是清代形成的。白云观庙会享誉京城,每年春节庙会香火极盛,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此外,还有报国寺、护国寺、隆福寺、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等庙会都是京城著名的大庙会,逛庙会是老北京市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化系统,释、道及其各种宗教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的载体,它是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民众了解传统文化、增长社会知识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新华文摘

〔半月刊〕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dizhi.w.cn

中国人文的思想库

信息库

聚焦学术动态
展现百家风采
——
承载整个时代

新华文摘 大小字号 两种版本 刊中唯一

■ 邮发刊号/2-243 82-243 各地邮局订购零售 ■ 国外代号/SM7
■ 期定价/10元〔小学本〕·13元〔大字本〕
■ 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文摘杂志社 ■ 邮编/100706

炎黄春秋 YAN HUANG CHUN QIU 2005年第**10**期

龚育之：我认识的于光远

何兆武：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

实事求是的几起几伏

秦家店的郡县制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